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1月15日第2期 总第24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46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26）

【专稿】

启之 陆平治校——北大的“反右补课”

【评论】

俞小平 事实与逻辑之二——与宫香政同学的再讨论

舒声 朱成昭与聂元梓的区别——兼论造反派的“异化”

【述往】

华新民 我们的毕业文凭

张从 一个鸭蛋和一条人命的故事

蒋世信 我与北师大——谭厚兰造反与大串联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恶战之前（十七）

【书摘】

唐少杰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一首狂飙曲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述评

【资料】

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

戳穿新北大团、零、飘、井、方的谎言

【读者来信】

1. 王家斌：开展红色文化研究是当务之急

2. 蒋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作者不是姚文元，而是张春桥

【封面说明】

【本刊声明】

【专稿】

陆平治校 ——北大的“反右补课”

启之



1957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改变高校“政治工作薄弱”“领导力量不足”的现状，“决定从中央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优秀的高级和中级干部以加强文教战线。”“目前有137名高级干部已经确定抽调，其中60多人已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137人当中，有副部长级干部五人，部长助理级干部十人，司、局级干部122人。人民日报告诉人们：“这批高教干部一般都具备政治修养较好、

（陆平：1914-2002）思想水平较高、作风好、身体好、能团结知识分子等条件。他们的文化水平和领导能力也是能够胜任各种文教部门的领导工作的。”这篇报道还特意提到了两个副部长，陆平是其一。¹

陆平，吉林长春人，1933年入党。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此后即放弃学业，从军从政。当过“民先”的组织部部长、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建政后，他当过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团中央常委、铁道部政治部主任。来北大前，他是铁道部副部长，行政八级，四十三岁。

陆平所以被选中，除了具备上述条件之外，还有三个原因：第一，1934—1937年间，他曾在北大教育系就读。尽管没有毕业。中央仍旧认为他是搞教育的内行。第二，他搞过青年工作，在调任铁道部之前，当过团中央的青年工作部部长。第三，彭真了解他——四

¹ 《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1957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另一位是财政部副部长刘墉如，他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这次被回到母校，担任副校长。

十年代初，彭真当晋察冀分局的书记时，他担任晋察冀青年委员会书记。彭真知道他政治上过硬，工作能力强，希望他能够扭转北大的落后局面。陆平对这种调动，起初是抵制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吕正操也都不愿放他。他还直接找到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安告诉他：“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去吧，将来有机会再调出来。”¹ 后来，他确实调出了北大，到七机部任职，不过，那已经是十八年之后的1975年了。

从1957年到1966年，陆平在北大主政十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反右补课、打反动学生、反右倾中整人，逼死邹鲁风、批斗马寅初等作为，以及在教学上瞎指挥，乱折腾。² 百度上说他“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赢得了北大广大师生的拥戴”，那是官方出版的《陆平纪念文集》上的说法。

陆平来到北大时，是1957年10月。此时，反右派运动已近尾声。按照中央“反右补课”的部署，被认为“反右斗争不力”、“右倾保守”的北大，自然要在新的党委书记陆平的领导下，把这一课补好。

42年后，陆平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补划右派分子还是经过一番工作的。各系和各单位报来的人数很多，远超过划定的173人，可惜我现在没的原始的数字材料。当时我和校党委常委们都感到数字太大，我把这一情况向市委高校党委反映了。高校党委很重视，书记杨述同彭珮云来校，和我及校党委有关同志共同逐个审查补划的右派分子，一致认为补划的右派分子中，按照中央规定划右派的标准，有相当一部分应属于可划可不划的人，决定不划。补划了173人。”³

原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的回忆，从另一个方面证实陆平的话。“反右补课开始时，陆平同志刚来，对北大的情况，包括原来反右的情况，并不了解。经过一段了解和工作以后，他对反右补课曾产生一些疑虑。我记得有一次我同他一起到物理系去参加一个会。我们边走边聊。在谈到反右补课时，他曾说：物理系，还有其它一些系，已经划了这么多右派了，

¹ 陆莹：《父亲陆平36年的沉默》，《陆平纪念文集》页12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² 详见李清崑：《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225期《记忆》（北京高校专辑21）。

³ 陆平：《岁月钩沉》，《陆平纪念文集》页27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再这样划下去，有的班，右派都要占多数了，这怎么行！由于陆平有这样的疑虑，加上市委也强调‘可划可不划的不划’，因而党委在讨论各单位报来要求补划为右派的师生时，比较慎重，有一批人没有批准划。”¹

原北大党委副书记王效挺也为陆平抱不平：“陆平同志进校前，已划右派 500 多人，陆平同志担任第一书记后，补划了 173 人。把划右派的主要责任算到陆平同志头上，是不公平的。”“反右派工作是党委集体领导……不能都推到第一书记一人身上……我们每个常委都应负重要责任。”²

在补划的 173 名右派中，教职员 20 人，学生 153 人。也就是说，北大的右派总数达到 699 人。其中教职员 110 人，学生 589 人。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1986 年校委会为落实中央 55 号文件，对当年的右派人数进行复查。得知“全校共划右派分子 716 人，教职员 120 人，学生 596 人。”³ 也就是说，陆平的反右补课又多划了 205 人。比江隆基时期增加了 40% 左右。用陆平的话讲，相当于一个团。⁴

那么，这二百多名右派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56 级物理系调干生沈志庸有如下回忆：

58 年由陆平替代了江隆基（据说因彭真不满江太右，把江换走）。新官上任三把火，取消了江宣布的结束“划右”。重新来深挖细找“右派分子”。原有的“反右”恐怖气氛骤然升高。

有一天班上开会，会上要求大家检举揭发章鹏的“右派”言行。散会前宣布章鹏从我们的寝室搬出去（仅我们三人住），并要求他交待自己的问题。章鹏划为“右派分子”后，我已不很自信了。不过我估计这次的补课也快结束。一天吃晚饭时，乐瑛在小饭厅找我，希望和我谈谈。在小饭厅外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她说：“现在对我的压力很大，你看怎

¹ 王学珍：《怀念陆平同志》，《陆平纪念文集》页 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² 王效挺：《澄清对陆平同志的一些不实之词》，《陆平纪念文集》页 2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³ 王学珍、王效挺等主编：《北大大学纪事》（1898--1997）第 108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⁴ 伊敏 1966 年 1 月 5 日在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会上的发言时谈到：“在反右派斗争中，北大共划右派 705 人，其中学生 591 人，占全校参加运动学生总数的 7.7%。其他高等学校学生右派一般 4% 左右。《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21）期。

么办？”我说：“运动眼看就要过去，这么长时间你不交待，现在再说人家会原谅你吗？挺挺过去算了。”她说：“那就这样吧。”我说：“好吧。”我们就分开了。

第二天下午，上课的时间，听到“嘟嘟嘟”的敲门声（我们熟人之间约定的暗号）。开门进来的却是班上的“反右”积极分子们，并拿了写好我是“右派分子”要老实交待的标语贴到了墙上。

我就这样直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这个程序有点不寻常，证明了我判断运动快要结束了是对的。他们已没有时间再来搞什么揭发、批判、交待后再来定你为“右派”这一套花架子了。后来周幼威告诉我，乐瑛是由领导指派前来试探我的。¹

物理系55级团总支书记宋林松，对补划中的细节，记忆深刻：

1958年1月底，北大刚经历过“反右补课”，于是召开了庆祝胜利的反右总结大会。这是自“5·19”以来从未举行过的到得最齐的全校师生大会。会议最后，由党委书记江隆基先生庄重宣布“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即不再抓出新的右派分子，并通告明天起开始放寒假。言犹在耳，我却在其后被“补划”成了右派。被有计划地补划为右派的非我一人，而是一群。例如我们级的党支书也是其中之一。

……很快地，划一个右派就十分快捷和“容易”了：班里开个会，无需事先告知大家，临时提溜出来的被划分子垂头丧气地站立在黑板前，三二个反右积极分子激昂慷慨地揭批一通，喊几句（群众漫应着）或不喊口号，不到半天就可以报销一个。……虽然如此，待到划我时，理应是最后一个了当更顺溜了，可是班里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竟要讨论三天以“统一思想”。……其实我的命运早就确定，真正划我右派的场景，据说颇有戏剧性。物理系工作组组长杨述先生随手从桌子上抓起一支铅笔，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划

¹ 沈志庸：《回忆片段》，载铁流主编《微事微痕百期精选》第二册，页55，香港，真相出版社，2014。

了一道信，这一划，划给我一顶右派帽子。¹

原北大历史系57级学生王曾瑜披露，“某人算不算右派。说是党支部没有定论，其实只要提出来，就不可能不定为右派”——

57级最初分三班，我所在的三班被分配参加54级考古班的反右派斗争。定为右派的最初只有胡琦，回想起来，他的思想似乎比较活跃，例如主张中国效法南斯拉夫，对苏联采取较为独立的态度，当时也算右派言论。1958年初是一个严寒的冬季，有时下雪。全校停止一切教学活动，集中时间处理右派，并且增加右派名额。由党支部提出情况介绍，交大家讨论，某人算不算右派。说是党支部没有定论，其实只要提出来，就不可能不定为右派。54级考古班新增两名右派。一位是段静修，他后来改名一平，经劳改后，转到我们57级。他显然颇为桀骜不驯，其右派言论有讽刺一位党员女同学为母系氏族社会氏族长等。在批判的全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如今回想起来，是极为不易的。另一位陈德钧，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象样的右派言论，也难逃一劫，这够得上是祖宗相传的“腹诽”之罪吧。最后，他只是流下了痛苦而委屈的泪水。²

原北大哲学系教授、党总支副书记谢龙记得——


陆平同志就任一个多月后，在处理右派分子时虽提出过“可划可不划者不划”，但已难遏制反右扩大化。如哲学系错批的人中，有的原不准备“正式戴帽”，也被错划为右派；有的原不准备开除党籍团籍，也被开除出党或开除出团；甚至有的两年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还“老账”、“新账”一起算，被打成右派等等。使更多的北大人遭难，回顾其悲

¹ 宋林松：《他们说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载《微事微痕百期精选》第二册，页79--80，香港，真相出版社，2014。

² 王曾瑜：《北大旧事：难忘的五年运动和学习生涯》，载《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第友回忆录》页167，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

惨情景历历在目。¹

谢龙说，陆平来北大有“来不逢时，身不由己地陷入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一面，但又有身负重任，主动积极地把重建北大的工作落到实处的一面。”在反右补课，主动积极的一面恐怕在陆平身上占优势。他担心的不是右派的命运，而是今后的工作：“当时我的思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右派分子之多给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如物理系、数力系有的班级右派分子占据多数，怎么能办下去？还有学校里有了这样一大批消极力量，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将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能完成得好吗？对于反右派斗争有什么错误，我的头脑是不清醒的。这件事做得是对的。可是，文革中聂元梓之流竟诬为‘包庇右派’，并列为我的若干‘反革命罪状’之一，否定历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²

如果说，江隆基的反右来自于有，那么，陆平的补课则是来自于无。江还有个政策标准，陆平则是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萝卜多了不洗泥。北大的反右是江、陆二人共同完成的。江隆基之所以受到称赞，是因为他被上面贬放，又惨死兰大。陆平之所以遭人痛恨，是因为他后来紧跟上，又做了很多坏事。

【评论】

事实与逻辑之二

——与宫香政同学的再讨论

俞小平

我的同系同年级同学宫香政最近又想起我来，在《记忆》第234期发表的文章《论“政治倾向性”》里，再次表达了他对几件北大文革往事与我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对一件事

¹ 谢龙：《忆陆平同志的待人风范与修复北大“创伤”的艰辛》，《陆平纪念文集》页5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² 陆平：《岁月钩沉》，《陆平纪念文集》页27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有不同的看法本属正常，但是必须有事实与逻辑作基础，在《论“政治倾向性”》里我没有看到应有的事实与逻辑。我不免在这里解释一番，以免不知情的读者被宫香政同学误导而误会我的本意。以下分三段论述。

一 “北大井冈山兵团没有‘三种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在《记忆》的一些关于文革的文章里屡次提到“三种人”，这里有必要简介一下。维基百科里对“三种人”作了如下解释：“‘三种人’指的是：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主持这场运动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派，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为主，目的是防止改革开放的方针被‘文革’遗留分子翻案。清理‘三种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党内进行人事调整的一项政治运动。”

文革结束以后，重新上台的反文革的老干部领导层对文革中的大量犯罪分子判罪，对于那些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罪行而又不够司法起诉判刑的，采取了界定“三种人”的清洗方针，将他们赶出干部队伍。这里所示的三种人的定义十分模糊，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偏差，以致于一些没有严重错误或罪行的人也被冤枉地戴上三种人的帽子，终身不得重用。具体而言，我们所知道的三种人不能入党，不能提拔当干部。

我在《记忆》第 172 期的《真相的迷雾——答章铎校友》（以下简称《真相的迷雾》）里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宫香政同学记在心里、屡次引用，这次又被他截头去尾，用在《记忆》234 期的《论“政治倾向”》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论“政治倾向”》里的引文。我把我的原文整段录在下面：

“虽然井冈山遭受聂元梓校文革和 63 军工宣队的接连诬陷和打击，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井冈山成员没有一个被判徒刑或被定为“三种人”，这在高校群众组织中是罕见的，也说明校文革制造的案件全部都是冤假错案！”

下面宫香政在文中承认了“俞文这段话是事实。”很好，宫同学这次肯面对事实。但是接下来的一段话，令我极为惊讶：

“俞文这段话是事实。俞文在这里向读者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是：经过邓小平的清算，证明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错误的，而对立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正确的。然而，俞小平却隐瞒了造成这种政治结果的背景和一系列的隐情。”

我已经在《事实与逻辑——就北大武斗答宫香政同学》（载于《记忆》第190期，以下简称《事实与逻辑》）里据实反驳了宫香政同学毫无根据的谣言：

“宫香政同学这段话是出于对我的观点的毫无根据的猜想。我从来没有说过北大文革中井冈山兵团是“正确的一方”。文革发动的动机是错误的，两派成立的宗旨是错误的，在政治大局上哪里会有“正确的一方”？两派犯错误只有多与少的区别，不是有与无的区别。希望宫同学不要在我的行文中想象出我没有表达过的意思。井冈山犯的错误少，没有人受刑事处分，重要原因是没有掌权，没有被文革中的无限权力所腐蚀。错误需要检讨，罪行需要清算。非法致人死命，非法抓捕、非法剥夺人身自由、非法酷刑逼供，在任何时候都是犯罪行为，都要被清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时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历史的报应。毋庸讳言，文革后清算文革中的罪行和三种人确有政治倾向。同样的罪行，在政界有背景的逃过去了，没有背景的只能去坐牢。但是如果你没有犯罪，没有伤害人命，谁能把你送入牢房？”

如今宫香政同学更进一步，竟然诬陷我，将本文作者，一个毫无背景的平民百姓，与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的所谓阴谋诡计联系在一起，竟然不需要提供任何事实根据。由此可见，宫香政同学的思想受文革斗争哲学阴谋论的为害有多深。

我在《事实与逻辑》里探讨了史学论文中的事实与逻辑，就是希望宫同学能明白事实与逻辑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深不愿他自堕谎言的罗网。我已经在《事实的逻辑》中说明了史学辩论所必须遵循的要素：

“我们北大老五届，由于文革的干扰，没有读完该读的课程，就被赶出北大之门。但是我们好歹都是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又在北大受过几年学术熏陶，说话、做事、研究学问，都得讲究两件事：一是事实，二是逻辑。以事实为基础，加以合乎逻辑的推导，才能得出正

确的结论，这是我一生都不敢忘却的。没有事实就妄加推论，肯定不能揭示出真相。”

如今宫香政同学竟然不顾事实、不讲逻辑、信口开河，令我深为失望，也必定让广大读者失望。

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我的论点：文革中的北大井冈山兵团没有人被定为“三种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如果宫香政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实，请你把它拿出来。如果没有，我希望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到此为止，不要再无谓地继续下去，浪费你我和读者的时间。

二 宫香政被定为三种人冤枉吗？

宫香政同学作为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暨新北大公社武斗副总指挥和西线武斗总指挥，在 1968 年 3 月底至 7 月底的北大大武斗期间，为聂元梓校文革在下列各项事件中做了帮凶：

1. 参加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总部会议，决定围剿井冈山兵团的战略战术；
2. 参加并主持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会议和西线武斗指挥部会议，决定围剿井冈山兵团的具体行动；
3. 组织、训练、装备钢一连、革命工人兵团等新北大公社专业武斗队；
4. 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执行下列攻击性作战任务：3·29 突袭强占 31 楼打伤大批化学系井冈山成员，冲击在海淀路边作为井冈山楼群唯一出口的 37 楼前的校墙豁口和前面的大棚；
5. 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捕从 37 楼走出的、在海淀路行走的、在海淀镇购买食品的井冈山成员；
6. 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拦截为井冈山运送粮食和物资的车辆，攻击运输和保卫车辆的人员；
7. 派出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在北京市的大街上抓捕、殴打井冈山成员；
8. 派出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到住在北京市的井冈山成员家中抓捕、殴打井冈山成员；
9. 派出新北大公社人员以权力机构校文革的名义到外地抓捕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和骨干

成员并迫害其家属；

10. 在新北大公社占据的楼群里关押井冈山人员，并对他们施以酷刑。

以上行为也许不都是宫香政同学的职权范围，有些行为在其他新北大公社负责人的职权范围内。

宫香政同学，这是我在《事实与逻辑》里列举的你在北大文革大武斗中所犯的十项罪行。你和其他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参加武装攻击、围困、抓捕、酷刑井冈山和非井冈山成员，你的眼中有他们的苦难，你的手上有他们的鲜血。就凭你的这些罪行，开除党籍、撸掉厂长、定你个三种人不是轻纵了你吗？你还敢自称“受害人”？我们在此辩论，你有权而且应该为自己辩护。可是自2017年7月31日登载《事实与逻辑》的《记忆》第190期发表至今，你没有为我所提及的你和你的同伙在北大武斗中的罪行说一句话为自己辩护，而是始终在没有证据的想象中妄加猜测，纠缠什么“妖怪的背景”。我在《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里列举聂元梓的六大罪状，也没有看到你为她做任何具体罪行的辩护。

说到《西游记》，在我们普通平民的心目中，《西游记》里的妖怪的最大罪行，不是挡了唐僧的取经路（说到底，那都是如来佛和观音菩萨事先安排考验唐僧的），而是伤了取经路上的人命。我们井冈山兵团，既没有打击迫害、以消灭对立派为目的武装开打，也没有在武斗中杀害人命、犯抓捕、关押、折磨、侮辱无辜校内师生及其亲属的非法暴行。无论文革中的毛泽东，文革后的邓小平和陈云，或者是文革后复职的老干部，井冈山兵团都不是他们眼前的挡路者和事后的报复对象。毛、邓、陈、老干部们为什么要清算井冈山？

在北大校内，校文革广建俗称“牛棚”的劳改大院，武斗期间关押多达二百多人的北大干部教师。在新北大公社的武斗据点里，关押过多达数百人的北大师生。多少人被关押、殴打、诬陷、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的被捅死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的长矛之下，有的被打死在公社武斗队的刑讯室中，有的英年早逝，有的终身残废。众所周知，井冈山兵团没有牛棚，也没有在武斗期间往井冈山自卫楼群里抓捕关押

过新北大公社成员。人都是有感情的，请宫香政同学想一想，这些被你们残酷无情地折磨迫害过的干部、教师、职工和学生，能站在你们一边吗？至于你对邓小平和陈云的论述，你是从别处抄来的，我看不出这与井冈山兵团的命运有什么相干。

三 牛辉林有什么罪？

牛辉林同学在北大文革史上是个名人。他是北大法律系64级学生，在反聂五派联合以前是“红旗飘战斗队”的头头。1967年8月17日反聂五派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长是已届高龄的周培源。牛辉林在一周后接替周培源，被选为总部核心组长。由于江青听信了聂元梓校文革对牛辉林的诬告，9月1日江青批评牛辉林“（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侯汉清接替牛辉林成为总部核心组长，以避江青的风头。

宫香政同学在《论“政治倾向性”》里大段谈论牛辉林在北大的所谓的“情况”，力证牛辉林应该是个“三种人”，而他宫香政不是：

“由于俞小平校友提到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谈谈我所了解的牛辉林同学的情况。”

下面是宫香政在他的《论“政治倾向性”》里例举的牛辉林的“情况”：

- 1，文革初期，当聂元梓红的发紫时，他紧跟聂元梓；
- 2，当王、关、戚得势时，他投靠了王、关、戚的亲信洪涛、刘郢；
- 3，当迟群、谢静宜在北大不可一世时，他积极靠拢迟群、谢静宜；
- 4，“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后，他又与邓家拉上了关系。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是在这里，当宫香政明显地表现出他在讨伐牛辉林时，列出了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牛辉林的“政治倾向性”。这样的四条政治倾向，足够把牛辉林定为“三种人”吗？我认为不能。下面我分别分析这四条“情况”给宫香政同学和诸位读者，看看牛辉林该不该被定为“三种人”。

第一条，“文革初期，当聂元梓红的发紫时，他紧跟聂元梓；”

“文革初期，聂元梓红的发紫。”这话非常正确。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将要无可挽回地在全国展开。通知在发布时刻是保密的，只传达到一定级别的中共党内干部。当时毛泽东在寻找一个公众事件，作为向全国人民发难的爆炸性突破口。5月25日，聂元梓在听到党内的传达后，和另外六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中共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6月1日毛泽东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这个行动所造成的震撼直达全国党政军和各族人民，从此中国在文革的道路上蹒跚而行达十年之久。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开篇劈头便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下面就不点名地直指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7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诸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等几乎全体成员齐聚北大，连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赶走张承先工作组，指令聂元梓组织校文革主政北大。中共领袖及党政要员，除了在背后主导运动的毛泽东，在案板上等着挨宰的刘少奇、邓小平，都来站台给聂元梓撑腰。自中共建国以来，哪一位基层干部受过中共最高领袖这样的支持？在毛表态以后，北大还有谁敢对聂元梓当政说一个“不”字？

宫香政同学，我必须诚实地向你坦白，在那个时刻我也是无条件地支持聂元梓的，我们班的全体同学也是无条件地支持聂元梓的。当时我们认为，谁不支持聂元梓同志，谁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所以当时牛辉林组建“北大红卫兵”紧跟聂元梓，那是再正常不过了。牛后来发现聂元梓的政治品质低下，毅然和聂元梓分手，这一点是应该称赞的，不像某些人死抱着聂元梓的大腿不放，以致犯下了更多的错误和罪行。

第二条，“当王、关、戚得势时，他投靠了王、关、戚的亲信洪涛、刘郢。”

从1967年春，由于聂元梓的专横跋扈不能容人，反聂派在北大再次兴起。当反聂派尚未联合成为井冈山兵团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诸公就开始以反聂派支持王力、关锋、戚本禹为罪名，攻击反聂派和后来的井冈山兵团。某些聂元梓支持者坚持这种谬论直到今天。

从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王力、关锋、戚本禹，此三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康生、江青、陈伯达手下执掌文革运动大权，气焰熏天。7·20武汉事件以后，王关戚转向“反对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言论和行动引起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的不满。当时全国文革有大乱失控之势，毛泽东出于以军队稳定全国的大局，将王关戚抛出来做替罪羊。王关戚的失势，不过是文革派内部分裂的结果。这显示毛泽东在打到刘邓以后，企图结束混乱收割文革果实的趋势。宫香政同学，难道你认为，王关戚在文革中的罪行和责任，比文革始作俑者毛泽东，以及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的罪行和责任更大？这样的观点符合事实吗？

从此以后，在过去的52年里，特别是最近几年，宫香政等人不断著文，攻击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牛辉林等支持了王关戚。我阅读了他们发表在《记忆》上的全部反井冈山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能证明，王关戚与井冈山的负责人有任何直接联系；井冈山的报纸为王关戚摇旗呐喊，正像当初大家支持“伟大领袖”的文革运动一样，正像新北大公社也为王关戚摇旗呐喊一样（不要说你们没有这样做，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上连篇累牍登了很多篇，你要是想知道，你可以到北大图书馆去读，我也可以给你发一个目录），正像我们两派都为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陈伯达，以及文革干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摇旗呐喊一样。没有一个群众组织能理解文革的本质而不这样做，也没有一个群众组织能不这样做而生存下去。宫香政同学找不到任何井冈山负责人与王、关、戚的直接关系的证据，因而拉出洪涛、刘郅等，等而下之的北京某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当替罪羊，不觉得过于可笑吗？我们北大井冈山兵团成员，并没有因为聂元梓与蒯大富关系密切，就把聂、蒯的关系当作聂的罪行啊！

北大文革中的两派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支持过聂元梓和她掌权的校文革的，至少有以下中共中央文革派的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而支持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中共中央文革派领导人：零。聂元梓是北京市革

委会副主任、首都红代会主任、北大校文革主任。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们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是一个没有后台的组织，无权无钱无势，只有一帮穷哥们儿，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等等。除了跟着“伟大领袖”糊里糊涂地为文革摇旗呐喊，就是在校内外抵抗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进攻，力争保全性命，不要落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对井冈山兵团的定性）。井冈山兵团做到了，到了文革后能讲理的时候，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周培源、牛辉林、侯汉清等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都洗清了文革中被校文革诬陷而加诸其身的罪名，周培源还当上了北大文革后的第一任校长。

第三条，“当迟群、谢静宜在北大不可一世时，他积极靠拢迟群、谢静宜。”

8341 部队在 1969 年 3 月主政北大后，负责人主要是杨德中、王连龙，迟群和谢静宜有时也来干预北大运动事务。根据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的统计，文革中北大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62 人（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的统计是 63 人），其中：

工作组统治期间（2 个月），死亡 4 人，平均每月 2 人；

校文革统治期间（2 年），死亡 23 人，平均每月 1 人；

4587 部队统治期间（7 个月），死亡 24 人，平均每月 3 人；

8341 部队统治期间（7 年），死亡 11 人，平均每月 0.13 人。

自 1966 年 7 月底，中央文革奉毛泽东的号令在北大连日召开全校大会，赶走工作组，北大大权落到毛泽东支持的聂元梓手里。大权在握的聂氏不能容纳异己，甚至把有不同意见的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哲学系左派战友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等赶出校文革，再加以迫害。聂元梓的校文革在校内建立俗称“牛棚”的劳改大院，关押、折磨、侮辱干部教师，建立“二组”这样的特务机构，秘密监视、收集师生员工的言行，向中央文革秘密诬告、迫害大批人员。当聂元梓的校文革不能控制局势、独占北大大权时，他们建立并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反对派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发起武装进攻，力图打垮井冈山，围困井冈山达四个月之久，直至毛泽东下令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收缴大学文革的主导权。在聂元梓的校

文革统治北大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23 人。

4587 部队（63 军的番号，当时军部驻石家庄）指挥的“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工宣队”或“军宣队”（端视主导者是工人还是军人）。63 军在文革中与北大校文革关系极好，他们几次派军队干部来北大主持军训，支持校文革的行动。在主管宣传队统治北大 7 个月期间，63 军与聂元梓及其下属站在同一立场，接过校文革的秘密档案，在北大整了九百多个反革命专案，数以千计的师生员工被整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或者反革命集团外围分子。其中著名者有：

继续迫害在校文革时期就被残酷迫害的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侯汉清、牛辉林、谢纪康、徐运朴等人及井冈山骨干成员。校文革在武斗期间为了摧毁井冈山，在全国各地与他们家乡的当地政府和造反派组织联系，以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诬陷、迫害井冈山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亲属，给这些亲属造成严重身心创伤，有些亲属被迫害身亡。63 军统治北大期间继续对这些井冈山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迫害，成立审查专案，诬陷他们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拉上全校大会批斗。63 军做到了校文革在掌权期间没有做到的迫害井冈山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暴行。

继续迫害从校文革的“牛棚”里被释放出来的干部和教师，造成包括翦伯赞夫妇、饶毓泰等著名学术权威的多名教师和干部被逼自杀身亡。

樊立勤，樊是生物系学生，因为反对康生被校文革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校文革于挑起 3.29 武斗之前，秘密抓捕关押，刑讯逼供，迫使樊承认校文革诬陷捏造的反革命罪行。樊宁死不屈，几乎丧命。63 军宣传队继续关押、审讯樊，仍然未能使樊屈服。

“陈齐程刘”反革命集团，成员为化学系（陈醒迈，齐菊生）和技术物理系（程汉良，刘立民）学生及井冈山兵团骨干成员。

“桥牌俱乐部”反革命集团，成员为地球物理系教师，其成员李其琛于 1968 年 12 月 8 日被逼跳楼自杀身亡。他的身亡为我所亲见。

“共产青年学会”反革命集团，成员为技术物理系学生何维凌、胡定国、王彦。

63 军的军人大老粗完全不理解当时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召开九大收割文革果实的战略计划，在北大大抓反革命集团，实际上打乱了毛的计划，引起毛的恼怒。毛在 1969 年 3 月派出 8341 部队（中央警卫团的番号，是毛的御林军），收缴 63 军的权力，改变北大宣传队的执政方针，直接执行毛的指令。所有以上九百多个专案全部撤销，所有文件火焚销毁，所有被关押人员全部释放。至少在表面上，北大终于风平浪静了。

现在我们回到宫香政同学例举的牛辉林的第三条“情况”。这时的牛辉林，不必像在北大武斗时期，被校文革通缉、被新北大公社特工人员在家乡追捕、原“红旗飘”同伴被“下狱”、无时无刻要为人身安全担忧的恐怖状态，也不必像 63 军军宣队统治时期，被审讯、被逼供、被威胁。这样的状态逼死了化学系 63 级的井冈山普通成员李人杰，他被工宣队审查逼供威胁，在长期痛苦的挣扎后吊死在北京北郊的一个小村里。我提起他，因为我认识他，当时听说他自杀后我很痛心。8341 部队进校后，牛辉林终于能够有一点安全感。作为北大文革中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之一，当 8341 部队受毛泽东之命解放牛辉林时，迟群和谢静宜与牛辉林谈话了解情况是应有之义。这算什么牛辉林“积极靠拢迟群、谢静宜”？在牛辉林毕业离校后，由于反井冈山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没有他们，8341 部队怎么会想起牛辉林？）的关照，牛辉林又被揪回北大，审查 5·16 问题。这是牛辉林受了你们的迫害，这是你们的耻辱，不是你们的光荣。当时在全国迫害几百万人的“清查 5·16 运动”完全是冤案，你也不是被诬陷为 5·16 分子的吗？你也知道，实际上全国没有一个所谓的 5·16 分子。

第四条，“‘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后，他又与邓家拉上了关系。”

牛辉林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技术物理系 62 级学生，在北大武斗时期被校文革抓捕关押逼供，被逼坠楼终身瘫痪）同为聂元梓校文革残酷迫害的难友，因而相识做了朋友，这是人之常情。他们做朋友，是他们的权利，只要不是违法行为，谁也无权干预。下面你又说：“2011 年，我在网上见到一则消息，说的是‘文革中，在北大，牛辉林是唯一正确的人’，又说‘山西省原来要把他定为三种人，是中组部开出证明信，证明牛辉林不是三

种人，使他免遭一劫’。网上的消息，未必可信。”既然宫香政同学自己都说“网上的消息，未必可信，”宫同学在这里重复它不是等于是传谣吗？怎么竟然还拿来当作攻击牛辉林的证据呢？

说到这里，我要问问宫香政同学，你论证了这么一大篇“政治倾向性”，到底要说明什么？就是因为曾经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牛辉林有某种你不欣赏的“政治倾向性”，你就盼望他是个三种人吗？

无庸讳言，由于文革后的社会的政治局限性，清查三种人运动冤屈了很多没有犯罪的造反派分子，或者轻纵了一些与文革后的当权派关系密切的文革中的犯罪分子，但是也处罚了很多确有罪行而没有刑事起诉的人。众所周知，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和骨干成员没有人犯有刑事罪行，而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和骨干成员有很多人犯有刑事罪行。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在北大文革期间、特别是在大武斗期间，犯有杀人、伤人、抓人、监禁人等罪行，这些人在文革后被起诉判刑，或被定为三种人，有什么理由觉得冤枉？

宫香政同学，如果你认为，你被定为三种人是不当惩罚，你可以对照我在前面给你列举的十项罪行，为自己辩护。你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平反。如果你承认确实犯了我在前面列举的那些罪行，你还是老实接受惩罚，认真反省为好。🔒

2018年11月30日

【评论】

朱成昭与聂元梓的区别

——兼论造反派的“异化”

舒 声

近日读到《文革博物馆通讯》1981期上王复兴的文章“文革史应浓墨记载的一个名字——朱成昭”，感到朱成昭确是一个应该研究的人物。作为北京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首都

红卫兵三司的司令，曾在北京高校文革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果他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亦步亦趋，一定会成为北京高校的学生领袖之一，进入红代会和市革委会，成为文革舞台的风云人物。但是由于他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又受到了彭德怀和叶剑英等老干部的影响，很早觉醒，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和批判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仅被免除了职务，而且被关入监狱直到 1975 年才被放出，1980 年才被平反，1998 年不幸早逝。他可以被称为一个“另类”的造反派领袖，或者被称为一个“异端分子”。他生前曾整理和写作了不少有关文革的回忆资料，去世前交给了其弟一北大经济系 64 级的朱成华，可惜不久之后，朱成华也去世了，这些资料至今未能面世，是十分遗憾的。

一 朱成昭与聂元梓的区别

按照王复兴文章所写，朱成昭在文革初期做了五件大事：

- 一、 反工作组，争自由；
- 二、 四进地质部，争人权；
- 三、 销毁黑材料，反迫害；
- 四、 同情彭德怀，为彭鸣不平；
- 五、 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

这五件大事在当时确实都是不同凡响的，其中前三件，应该是符合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符合中央文革要求的；而后两件，却是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而现在看来却是一种英雄的壮举。特别是 1967 年 2 月 4 日，朱成昭在地质学院全校大会上的“假检查，真炮打”，亮出了所谓的八大观点，直接批评了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更是一种十分勇敢的行动。王复兴在文章中称赞朱成昭是“老五届大学生中从反抗专制压迫，到迷茫（应为迷惘）、彷徨，再走向觉醒的杰出典型，是先知先觉者”，也许并非过誉。

但是王复兴文却笔锋一转，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聂元梓身上。聂于 1967 年 2 月后，

对文革发生怀疑，证据即她于1967年2月、7月、8月，三次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自己辞去校文革主任之职。第一次在2月，在新北大公社战斗队联席会议上，她的提议被群众否决；第二次在7月，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上，她的提议被常委会否决；第三次在8月，在中央文革接见会上，她的提议又被否决，并遭到江青严厉批评。她被毛泽东树为文革的一面红旗，却想撂挑子不干了！背后一定有深刻的考虑，她是怎么想的？”

把聂元梓和朱成昭相提并论，认为聂元梓也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一路人。

众所周知，聂元梓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第一个造反派典型，是江青点名让她主持筹建了全国高校第一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成为主任，1967年又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而且一直紧跟中央文革和江青，直到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才被剥夺了权力。说她和朱成昭相同，在1967年就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够令人信服的。我们就按照王复兴说的五件事，来比较一下朱和聂的不同：

（一）朱成昭受工作组迫害，争自由，聂元梓受工作组信用，是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虽然没有实权，但起码是有自由的，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她只是在7月22日，得到内部消息后，才在哲学系讲话批评工作组，之前没有任何反对工作组的言行。

（二）朱成昭四进地质部，争人权，聂元梓和校文革把大量的干部、教师关入牛棚，剥夺他们的自由，被监督劳动，监管人员对他们非打即骂，严重侵犯了他们的人权，这在季羨林的《牛棚杂忆》和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中都有很多记载。¹

（三）朱成昭销毁黑材料，反迫害，聂元梓的校文革却继承了工作组的“二组”和黑材料，又新整了许多干部、教师 and 学生的黑材料，迫害不同意见的群众²。她为了彻底消灭反对派组织，竟悍然发动了3·29大武斗，把反对她的学生从31楼宿舍中赶出，并围困反对派的学生达4个月之久，断水、断电、断粮，打死无辜学生3人，打伤数百人，私设

¹ 详见季羨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98；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2014。

² 舒声，北大校文革二组整了哪些“黑材料”，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页286-289，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监狱，随意抓捕学生、教师，刑讯逼供，导致多人残废（如邓朴方、樊立勤等）。¹

（四）朱成昭同情彭德怀，为彭鸣不平，而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和下属组织积极参与攻击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她控制的喉舌《新北大》校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许多攻击和反对老一辈革命家、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的文章，例如该报最早刊登了攻击朱德同志的文章，1967年2月6日第一版至第四版：《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1967年3月4日第四版：《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对于朱成昭同情的彭德怀，《新北大》也毫不留情，在1967年8月9日第一版至第三版刊登《打倒老牌反革命彭德怀》，在1967年8月26日第一版刊登《彭德怀的海瑞精神是什么货色》。《新北大》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负责人的文章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影响之广，在文革报刊中都是十分突出的。²

（五）朱成昭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紧跟中央文革，效忠和谄媚江青。1966年7月26日晚上，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亲自点名让聂元梓筹备成立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自此聂和校文革始终效忠中央文革和谄媚江青，甚至到了肉麻的程度。例如1968年3月27日，《新北大》第2版，以“本刊编辑部”名义提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第三版高唱赞歌《革命的硬骨头、毛主席的好战友—学习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写到：“新北大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和江青同志心连心。”

1968年5月13日，《新北大》第二版，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提出“谁反对江青同志，就让他人头落地”。1968年7月1日《新北大》第二版，发表《江青同志赞》，盛赞江青“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旗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毛主席这首震撼山河的千古绝章，

¹ 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樊能廷：《“人道的用刑”与三个学生的遭遇》，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页236-252，392-402，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² 张从，从校刊《新北大》看北大文革，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页320-330，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

1968 年 7 月 5 日,《新北大》出版歌颂江青的专辑,在社论《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中肉麻地吹捧:“江青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她光辉的名字永远彪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史册,她英雄的业绩在耸入云天的中国革命丰碑上永远放射着不可磨灭的战斗光芒!江青,这响亮的名字,永远和青春联系在一起,永远和战斗联系在一起,永远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永远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联系在一起!想起您,我们就激情如潮涌;听到您,我们就力量百倍增!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亿万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我们最高红司令!”¹

至于王复兴所说的聂元梓的三次辞职,只是在少数人参加的内部会议上提出的,北大绝大多数师生并不知道。当时的背景是:1967 年春季,在北大开展的整风中,许多群众包括校文革内部成员和聂元梓往日的社教战友,对她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她非但不接受,反而给这些提意见者扣上“反对红色政权的帽子”,把一些校文革中不同意见者赶了出去,导致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人数越来越多,成立了许多反对她的群众组织,打破了她的一统天下,聂元梓恼羞成怒,以退为攻,提出辞职作为要挟。

此外由于她在社会上到处伸手,与谢富治产生矛盾,触犯了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对她提出了批评(如陈伯达的 6.5 讲话),在此情况下,她提出辞职,也是一种试探,看中央文革是否还继续支持她,后来江青、陈伯达讲话,说对她的批评是对她的爱护,不是要打倒她,于是她也就不再说辞职的话了。可见聂元梓的辞职不过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要辞职。把她的辞职说成是怀疑文革,反对文革,是毫无根据的,把她和朱成昭相提并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¹ 樊能廷,北大校文革与江青,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页 254-266,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二 关于文革造反派的“异化”

王复兴在其文章的最后，提出一个造反派“异化”的概念。“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360百科上说：“人的异化是指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太好理解。估计王复兴也未必对异化这个概念有什么研究，他说的造反派异化应该是指造反派从文革开始到以后的变化吧，我们姑且这样理解。

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提法应从清华附中红卫兵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开始，一般指的是造本单位党政领导（走资派）的反，或造被派到本单位的工作组的反的个人或组织，例如北大的聂元梓是造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珮云的反，清华的蒯大富是造工作组和王光美的反，地院朱成昭是造工作组和地质部领导的反，中学红卫兵是造本单位校长、书记或工作组的反，上海王洪文是造市委的反等等。这些造反派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到7月底）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但随着毛泽东7月底回到北京，工作组的撤出，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多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得到了支持，士气大涨，成为文革的主力军，很多造反派领袖在本单位掌了权有的甚至到省市、中央当了领导人。但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组织在不断变化，造反派头头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分化。本人对此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在此简单地区分一下造反派变化的几种类型：

（一）膨胀派

这类造反派的头头在得到中央领导支持，掌握了本单位大权后，头脑膨胀，自以为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不得不同意见，对反对自己的群众实行镇压。这类造反派头头以聂元梓和蒯大富为代表，他们分别掌握了北大和清华的大权后，在社会上紧跟中央文革，成为中央文革的工具，在校内残酷迫害干部、教师 and 不同意见的学生，把反对自己的群众抓起来，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直到1968年春季发动武斗，围困对立面组织的群众，打死打伤多人，1968年7月27日，蒯大富竟利令智昏，打死打伤

制止武斗的工人宣传队员，惹怒了最高领袖，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文革后期，他们被隔离关押，文革后被判刑。全国各地造反派头头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例如王洪文也属于此类。

（二）觉醒派

这类造反派，初期也参与了和本单位领导或工作组的斗争，当上了头头，甚至得到中央文革的信任，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些是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有些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发现了文革的问题，及早地觉醒，不愿再做文革的工具，甚至反对文革。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朱成昭。此外江西还有一个李九莲，也应属于此类。李九莲原是赣州第三中学学生、学生会学生部长、校团委宣传部长。文革中任第三中学造反兵团负责人。1967年6月29日-7月4日，江西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168人死亡。李九莲在收尸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疑问。1969年2月，李九莲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这她将自己对“文革”的思考写入日记。同年5月1日，李九莲被部队的男友告发而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审查。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李九莲因当局拒绝为其平反而继续表示抗议，12月，写了《我的政治态度》。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省委认定李九莲在服刑期间重新犯有反革命罪，同意波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李九莲死刑，并放在其家乡赣州执行。当天，在赣州体育场召开了公判大会，李九莲被五花大绑，押至公判大会现场。为避免她在公众场合呼喊口号，她的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上午10时，李九莲被押往西郊通天岩下受刑。

1980年1月，胡耀邦作出批示，此案得以重新审查，李九莲获得平反。¹这类觉醒派，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许多。


¹ 老鬼：《李九莲案始末》，新浪博客，2015。

（三）再造反派

这里所说的再造反派指的是从原来的造反派队伍里分离出来，再次造反，造的是原来造反派头头的反，也就是造“膨胀派”的反。例如聂元梓、蒯大富在掌权后依仗中央文革支持，倒行逆施，镇压群众，他们原有队伍中一些人发现了问题，有不同意见而受到了排斥，就拉出一支队伍，反抗聂、蒯，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清华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等新的组织，人数也有数千人之多，形成了校内的反对派，其领袖有牛辉林、侯汉清（北大）、沈如槐、孙怒涛（清华）等。他们中有一些人对文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行为制约了膨胀派的继续膨胀，受到了膨胀派的打击镇压，导致了大规模武斗的发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派工人、解放军进驻学校，解除了膨胀派的权力，成为文革进程的转折点。这类情况在地方造反派组织中也有很多发生。

（四）逍遥派

这类人物在中学造反派中居多。文革初期，他们成立红卫兵和纠察队，在“红八月”中很出风头，破四旧，抄家，殴打、驱赶城市中“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甚至打死本校的校长、老师。后来他们自己的父母大都成了“走资派”，情绪自然一落千丈。他们中有些人对江青也有看法，曾被短期关入监狱。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逍遥派，不再过问文革运动。1968年，他们大都上山下乡，有关系的参军去了。当然，逍遥派并不是对文革没有看法，文革后他们中很多人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有些人成为了官员、企业家、学者、作家。

造反派的遭遇和他们的思想变化过程，应该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本人只能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这种简单的分类，也许并不科学。但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述 往】

我们的毕业文凭

华新民

1968年7月是我们625（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5系）62级）毕业的正式日期，所谓正式日期，就是从这个月开始算国家正式工作人员，领国家规定的工资，今年是我们毕业50周年。有的人会说：且慢，科大当时是五年制学校，62级应该在1967年毕业，怎么1968年才毕业呢？问这个问题的人想必没有经历过文革，他们不知道，1966年爆发的文革，使得大学不仅停止了招生，也停止了毕业——66届以下的在校学生都被留在了学校，充当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闯将”。于是，本来应该在1966年夏天毕业的66届同学被推迟了一年多，到1967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66届学生才陆续离校走上工作岗位。1968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我们67届据此文件在1968年7月毕业，在校时间实际为六年。68届同学则于1968年12月毕业，延迟了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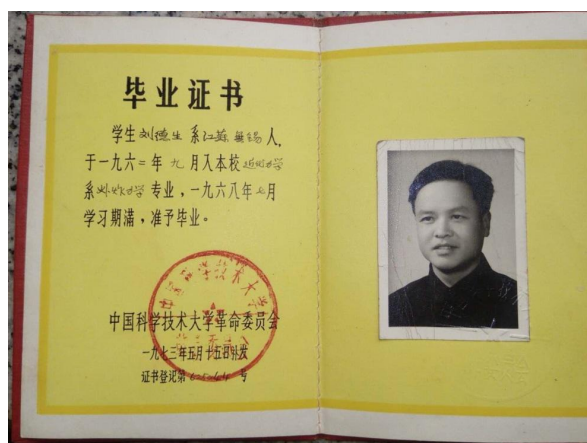
625的同学65年9月开始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66年6月草草结束四清被召回学校，投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下半年陆续离校。六年在校时间的后三年里没有接触过书本和学业，当然谈不上毕业考试或论文答辩，所以我们不仅推迟毕业一年，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由于文革中派性造成的分裂，加上有部分同学毕业时被隔离审查或留校“待分配”，同学们也没有在一起合影过一张毕业照。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残次品，政府费了一番心思和努力才好不容易把我们推销给了各个部门和省市，大部分同学要先到军队或地方的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比如我本人就分配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勐海解放军农场。那时学校由进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持，这些宣传队的成员有来自解放军的，称为军宣队，有来自工厂的，称为工宣队。军宣队/工宣队决定每个毕业生的分配去向，宣布之

后就发给每个准予毕业的同学一张相当于介绍信的派遣证，没有发给正式的毕业证书或文凭，记得当时军宣队的领导说：“你们是否算合格的毕业生，要等你们经过再教育之后由工农兵说了算。”

当时也有的学校是发了毕业证书的，比如我认识的一位北大同年级同学，就有“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签发的毕业证书，盖有宣传队指挥部的大印。证书印有“最高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毕业证书正文中最有实质意义

的一句话是“学生×××……现已毕业，走向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战斗岗位。”

我们科大62级的学生后来还是拿到了毕业证书，但那是毕业后五年由学校补发的。1973年，学校向我们62级的毕业生寄送了迟到的毕业证书。我的毕业证书是这样写的：



学生华新民系江苏无锡人，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入本校近代力学系航空发动机热物理专业，一九六八年七月学习期满，准予毕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补发。（盖有革委会公章）

同北大在1968年发的毕业证书相比，科大的证书除了有“革命委员会”的落款，已无“工农兵”、“战斗岗位”之类的革命辞藻，反映了1973年的政治氛围已经跟五年前不同，或许也反映了科大搬到合肥后已远离政治中心。证书中所说的入学和离校时间，都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其中提到的专业，跟我毫无关系。我们力学系的学生，要到三年级的下

学期才分专业，我在三年级上学期尚未结束的时候即被学校调离力学系到“英语专修班”全职学习英语，准备毕业后留校充任英语教师，所以我没有进过力学系的任何专业，也没有跟同学一起下乡四清。只是后来文革爆发，到毕业时学校命运尚在未定之天，校方让我回到力学系参加分配，我就随便在“航空发动机热物理”和“爆炸力学”两个专业之间挑了前者算是自己的专业，虽然从未上过该专业的课程，它却伴我一生。每当说到自己的大学学历时都要重复一遍上面这段话来澄清文凭里的不实之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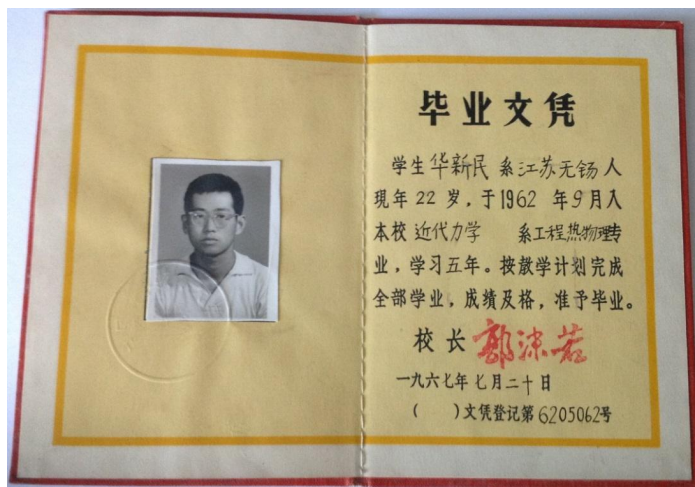
由于下面要讲的原因，我的手上已经没有这本毕业证书，下面照片所示的是我们 625 同学刘德生保存的 1973 年收到的毕业证书。看得出来，“学习期满”的年份一九六八是事先印好的，可见这是专门为 1968 年毕业的 67、68 两届学生印制的。我的证书除了姓名和专业不同以外，其它都是一样的。

至于当初学校为何在 1973 年作出给离校多年的学生补发毕业证书的决定？我们无从知道。不过今天回顾四、五十年前的那一段历史的演变，或许可以这样说：1971 年 9 月 13 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出逃机毁人亡的事件，此后的一段时间极左路线的推行有所收敛，文革进入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右倾回潮”的阶段，这个阶段到 1974 年初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告终。就在这大约两年时间的“窗口”期，66 年被打倒的校党委书记刘达得到了“解放”并官复原职。刘达在恢复职务之后，做了一件至今被校友们称道的事情，这就是开办“回炉班”，把一部分学历残缺的 64、65 级学生召回学校进修深造，使他们成为日后科大青年教师中的重要力量。补发毕业证书发生在同一时期，看来也不是偶然的，这件事至少得到了刘达的批准，很有可能就是他想起了我们这些草草离校的 62、63 级学生而提议的。他肯定记得，当年坚持认为刘达是好干部、为解放刘达奔走的师生中，这两个年级的同学是主力，很多同学为此而在毕业分配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

不过我现在手上已经没有了 1973 年补发的文凭。1981 年我通过李政道先生主持的 CUSPEA 考试前往美国留学，出国前夕，学校大概觉得革命委员会签发的毕业证书拿到国际上去“中国特色”太浓重了，甚至可能得不到承认，于是让我把 1973 年补发的毕业证书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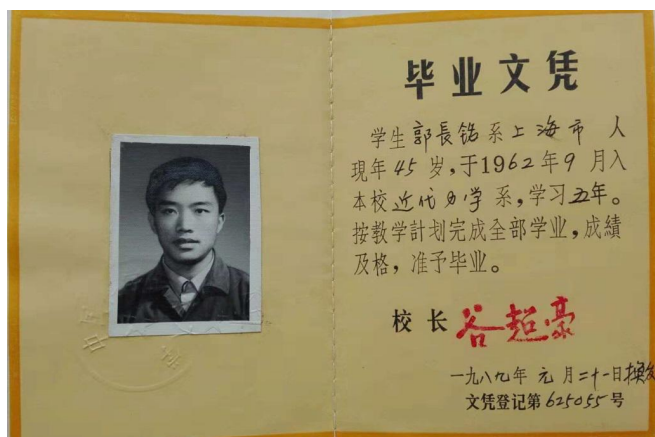
上去，换了一张如下的毕业文凭：

今日细看这本文凭，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是一本文革以前的毕业生用剩的空白文凭，上面已经盖有郭校长的印章，而郭老已于三年前仙逝。这份毕业文凭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从手写的字体上看，是我本人的笔迹，但不是我自己随意填写的，而是学校有关人员告诉我如何填写，目的是让外国人看了之后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学生，毕业于一所有正常教学秩序的、由一位著名学者担任校长的学校。然而如上文所说，我和同学们在科大的期间恰恰是一个极为不正常的时期，所以短短几十个字就有若干造假的破绽，如当时力学系并无“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尤其是文凭说我“学习五年。按教学计划完成全部学业”，而实际上我在学校待了六年多，至少有两年是参加文化革命，这显然不能算是在教学计划之内。为了与“学习五年”一致，又编造了一个假的发证的日期：1967年7月20日。可以说，这是一份假的真文凭。说它假，因为它不反映我在科大的真实经历。说它真，因为确实是科大盖了钢印的文书，不是地摊上买来的。我携带着这本毕业文凭三十几年直到今天，在国外只用过一次，就是到圣迭戈加州大学的研究生院报到时递进去文凭和成绩单的英译文本，也许因为我们这批学生是通过了李政道先生主持的考试的，美国的学校并没有对我的大学文凭给予特别的审视，几年后获得了更高的学位，就没有人要求看我的大学文凭了。



今天我们 625 的不少同学仍保留着 1973 年由革委会签发的毕业证书。也有一些同学因为出国学习访问或定居求职的需要，或者觉得革委会的证书含金量不如由校长签署的文凭，向学校更换了新的文凭，但是文革前剩余的空白文凭已经告罄，他们更换后的文凭大多是后来重新印制的，下图就是 625 的同学郭长铭在 1989 年换发后的毕业文凭，可以看出，同我出国时得到的版本稍有不同，不再列出所学专业，这大概是一种同国际接轨的做法，因

为国外的文凭一般不会注明系以下的专业。当然，不再有郭沫若的印章了，而是由换证当时的校长盖章，发证时间也用了真实的日期并如实注明了“换发”二字。然而，“学习五



年。按教学计划完成全部学业”的说法，仍属不实之辞。没有办法，这是学校给所有毕业生印制的文凭，总不能为我们这几届特殊时期的毕业生印制另外版本的文凭吧？再说，本来就不能指望简短的文凭把我们这些同学形形色色的曲折经历一一反映出来。

同一个系同一个年级的同学，同时毕业离校，毕业文凭却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发证的年份则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1967年、历经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跨度达三十年。签发文凭的有郭沫若、革命委员会、严济慈、谷超豪、汤洪高……等。值此毕业五十周年之际，立此存照，为科大在那“艰辛探索”年代里的历史作一个小小的注脚。

（刘德生和郭长铭同学提供了他们保存的毕业文凭的照片，许多625的同学以及其他年级、其他学校的友人提供了他们毕业时的经历和资料，在此谨致谢忱。）

2018年10月

【述 往】

一个鸭蛋和一条人命的故事

张 从

看到这个标题，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一个鸭蛋和一条人命有什么关系？请耐心地读下去，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69-1971年，清华北大两校的部分教师、干部按照工、军宣队的指令，来到江西鄱

阳湖畔一个叫鲤鱼洲的地方，办起了五七干校（后来改名为试验农场和江西分校）。这个地方条件非常恶劣，干校的学员们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糙米饭，缺少蔬菜，经常是咸菜或酱油拌饭，干的是重体力活，气候炎热潮湿，更严重的是这里还是血吸虫病的灾区，很多人在下水田劳动时感染了血吸虫病。据当时的8341部队干部、北大鲤鱼洲试验农场党委书记卢鸿盛的回忆和北大中文系教师的回忆录《鲤鱼洲纪事》（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记述，在此期间，北大师生在鲤鱼洲非正常死亡共有7人，其中有一位名姓孔的教师就是本文的主角。

卢鸿盛在自己的小册子《从未名湖到鲤鱼洲》（自印本第23-24页）里写到：

1970年5月新建打谷场，需要一个看场的，主要任务是防火。看场的原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高级试验员，五十岁，名叫孔祥真（注：应为孔祥莹），在校时别人对我说他是老光棍，他不去食堂吃饭，主要吃罐头，衣服脏了不洗，换下来的衣服不洗又穿上。在文革中他向别人介绍倒到走路能治腰颈病，造反派批判他是侮辱社会主义要倒退，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说小报上有介绍，此法确能治此病，不要再批判了，也不要打成反革命，他有精神病，应该让他去治病。此人不应到分校来。双抢时早餐每人发一个熟鸭蛋，他早上没吃，晚上吃下后，很快就上吐下泻，发高烧昏迷。我问医生是什么病，医生说吃了变质的鸭蛋，是恶性痢疾，大堤不能行车，鲤鱼洲无法治，当晚病故，送南昌火化。

中文系教师陆颖华之子、1970年只有13岁的胡山林也来到了鲤鱼洲，进了“五七中学”。42年后，他在《鲤鱼洲无鱼》里写到：

听不到任何对于饮食的怨言，人们除了沉默别无选择，但就是这种沉默，无时不让人感到生命的悲鸣。母亲所属七连，图书馆系的一位老师突然生病，得的是中毒性痢疾，没有及时发现确诊耽误了抢救时间而故去，人们得知后无不震惊。我住在七连男宿舍的时候，

那个老师的床铺和我的床只有咫尺距离，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只觉得显老。戴着一副玻璃厚厚的眼镜，走路蹒跚，话语少得不能再少，走路从来喜欢低着头，对四周一切一无关注。他平日很少与人接触，见到我时倒时时面带微笑，偶尔问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有一次，食堂给每人发了一个咸鸭蛋，他吃得非常在意，舍不得一次吃完，一次只是用筷子尖挑一点点，尝尝滋味，然后藏起来，留到下一顿再吃。结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鸭蛋耐不住夏天 38 度的高温，放到第二天就变质了。小小的一个鸭蛋竟然就这样把那个老师的生命留在了鲤鱼洲。（陈平原主编：《鲤鱼洲纪事》，第 329 页）

卢鸿盛和胡山林的记述说的是同一件事、同一个人，都说的是因为吃了一个变质的鸭蛋，引起中毒性痢疾，由于不能及时救治，导致一条生命离去的悲剧。

这位在鲤鱼洲不幸离世的北大教师的家世和生前情况究竟如何？一直没有见到其他任何记载。直到今年年初，部分清华教师员工的子女拟编写一本《梦萦清华园》的回忆录，委托笔者作为主编，看到一篇来稿，作者署名孔祥琮，是中国农业大学退休教师，已经 82 岁，他在题为《我的一家与清华》一文中说：

大哥孔祥莹和大姐孔祥兰同是 1927 年成志学校（笔者注：成志学校是解放前清华大学的子弟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的学生，那时因学生较少，所以上课时是不同班级混合上。因为孔祥莹成绩优异，获得了时任校长马约翰的特别奖励（刻有奖品字样的约 10 厘米见方的黄铜墨盒和一块火车头牌怀表，文革期间抄家时皆被抄走），而且让孔祥莹协助老师带班上课。兄妹俩同杨振宁是同班同学。

孔祥莹南开中学毕业，大学先在南开大学，后因“七七事变”转在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因为英语很好，担任过驻我国美军的翻译。解放后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他身体很好，会花样滑冰，会玩火棒，也是网球高手。1970 年在北京大学鲤鱼洲农场，因患急性中毒性痢疾未得到及时医治而去世，年仅 52 岁。

我才得知，孔祥琮就是孔祥莹的弟弟。

我在中国农业大学东区居住，与孔祥琮老师家相距不远，看到这篇稿件，立即到他的住处拜访，了解到了孔老师的家庭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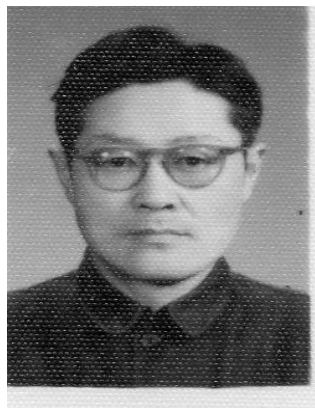


据孔老师介绍：他的父亲孔繁霁是一位史学界的前辈，字云卿，山东滕县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1912-1917年在南开学校求学期间与周恩来是同学和挚友，曾一起办过南开学校的校刊《敬业》，周恩来任经理部总经理，孔繁霁任编辑部总编辑，一直合作到毕业为止。周恩来和孔繁霁都为校刊写过大量有正义感和血性的文章，有时他们还分别以“拙”（孔繁霁的笔名）和“飞”（周恩来的笔名）的笔名合作撰写

（孔繁霁 1947 年于清华大学）文章，在南开大学的档案中可以查到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孔繁霁南开学校毕业后赴美欧留学，1920 年毕业于格林奈尔（Grinnell College）大学，1922 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3 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留美期间，还担任过南开留美同学会会长和山东留美同学会书记。1927 年，得到陈寅恪教授的推荐，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当年即回国任教，是当时历史系三位教授之一（蒋廷黻、刘崇鋮、孔繁霁）。

孔繁霁先生不仅精通中国史，而且精通欧洲中古史和欧洲古今文学，并精通英、法、德、意、希腊语言和拉丁文，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清华承担了“史学原理”、“西洋中古史”、“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培养出何炳棣、张贵永、谷霁光、吴晗、曹禺等学生。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他因病未能随清华南迁，滞留北平，但不愿为日本人服务，在私立的中国大学教书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抗战胜利后继续回清华大学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50 年代周恩来到北京大学视察，看望教职员时，见到坐在第一排的孔繁霁，特意走过来和他握手，交流了往日的情谊。孔繁霁在北大期间身体日渐衰弱，有时只能在家中为学生授课，1959 年不幸逝世，享年 65 岁。

孔祥琮告诉笔者：“父亲调到北大后，先在燕东园居住，与翦伯赞、周先庚教授为邻，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大哥孔祥莹搬到朗润园的两间平房，文革中北大造反派来抄家，拉走一汽车书和碑帖字画等，连书柜都拉走了。大哥 1969 年夏天第一批去鲤鱼洲时，我正在内蒙工作，特地赶回北京，帮助大哥收拾行李，并把大哥送上开往北京火车站的汽车，谁知那就是兄弟二人的诀别。



1970 年大哥在鲤鱼洲去世后，北大打电话通知我，但我单位的军宣队不准假，是二哥和二姐去鲤鱼洲的，他们到了鲤鱼洲后，军宣队说：孔祥莹不是因公死亡，没有抚恤金，只是把一个装着大哥遗物的箱子给了他们，骨灰也没有给。大哥遗物中有他的照片和一

（孔祥莹的遗照）个日记本，我至今保留着。

孔祥琮拿出了大哥的照片和日记本给笔者看。孔祥琮还拿出他 1949 年在清华成志学校小学部的毕业纪念照给我看，我惊奇地发现，上面竟有家父张骏骥，当时他正在该校任教。孔祥琮说他还记得张老师，是教他们国文的，课讲得非常好，待人也很有和气。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家父的学生，我们现在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还真是挺有缘分的。孔繁霁育有三子三女，皆学业有成。孔祥莹为长子，不幸早逝。

二子孔祥城毕业于北京崇实男中（现在的北京第二十一中学），后来考进北京辅仁大学学习，在即将毕业时，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以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成为了人民空军的特别设备工程师，后来被



抽调进我国原子弹试验基地，（成志学校小学部 1949 年毕业照，四排右 1 为家父张骏骥）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他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而被迫离开基地，转业到了

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所担任副任所长，直至离休，现已九十高龄。

长女孔祥兰在成志学校毕业后，进入并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在不同省市的中学担任高中的语文和英语教师，一直是一位优秀的语文与英语老师直到退休，2015 年 95 岁时病逝于四川成都中国民航学校。

二女孔祥荃毕业于北京崇慈女子中学（后来的第十一女子中学，现在是 156 中学），后来考入北京医学院，在即将毕业时，响应国家号召，离校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又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再转入人民海军医院。转业后进入中科院微生物所，担任微生物学报编辑部编辑，直到退休。



三女孔祥蕙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化工系，曾任鞍山钢铁公司工程师、宝山钢铁公司焦化厂副厂长、高级工程师，已退休。

孔祥琮是家中幼子，从清华成志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北京第 25 中、第 65 中学习，1956 年保送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1961 年毕业后（笔者与孔祥琮老师）分配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工作，1976 年调回北京母校工作，1982 年入党，曾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1996 年退休，现身体尚好，记忆清晰，还时常参加老同学的聚会活动。

我衷心祝福孔祥琮老师全家健康幸福，也深切悼念在文革中不幸辞世的孔祥莹先生和其他逝者，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华大地上永远不再发生。📖

2018 年 10 月 23-24 日

【述 往】

我与北师大

——谭厚兰造反与大串联

蒋世信

谭厚兰等人的大字报搅乱了师大的平静，像多米诺骨牌效应，各个系都陆续贴出许多大字报，开始是在几个饭厅、后来在各个教学楼贴大字报。数学系主要在四楼和一楼的四面墙上，批判凯洛夫教育学：“顿河之水天上来，培养修资毁人才”，批判数学系忠实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再后来大字报集中贴（挂）在教2、教3楼的楼道里，所贴的内容对我来说都十分新鲜，我记得有关于彭真“二月兵变”的，有关于陆定一停职受批判的（陆的小女儿陆瑞儿是我校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最让我震惊的是揭露贺龙在八一队养了20多个棒小伙儿，每个月从他们身上抽血制成血制品供贺龙营养，以保他头发不白容颜不老，消息真假无从确认，但确震撼人心。……后来大字报太多了，校园甬道两侧都建了大字报苇席墙，供师生贴大字报与观看。

乱了几天，六月六日刚吃过晚饭，有人大喊“工作队进校了”，我们急忙跑到校门口，只见从一辆黑色的轿车下来一位穿着白色短袖汗衫、容光焕发、头发一丝不苟、大约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原来他是一机部第一副部长孙有余，这次作为工作组组长进驻师大领导运动。孙被人引到主楼二层北面的凉台上发表演说：“我们是北京新市委派出的工作队，来到师大就是像剥笋皮那样，将师大党委的假面具一层层地剥下，露出他们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干巴脆的讲话引起人们热烈地鼓掌，运动在工作组的安排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过了半个月，即6月20号数一（2）的高树奎、武汉等十几位同学，在北饭厅贴出大字报《孙有余把运动引向何方？》，一石激起千层浪，师大又乱套了。为了稳住阵脚，孙有余发表广播讲话，强硬指出反工作组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干扰，组织反击大字报，举行“群众抗议游行”。当时，谭厚兰是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高呼拥护工作组的口号。可

是，三天后谭厚兰却来了个 180 度的大调头，与政教系另外 3 人贴出质疑工作组引错运动方向的大字报，引发了师大新的地震。原来，谭支持工作组的行为立即受到林杰、关锋的批评，责其迅速改正，于是她对工作组“反戈一击”。说实在的，对于谭厚兰的“造反”，我一点儿也不佩服。因为 65 年年初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各报刊人手不够，北大、师大、人大等高校文科都派了即将毕业的学生去实习，我校政教系五年级的调干生谭厚兰（党员）去了《红旗》杂志，她的第一张炮轰师大党委的大字报就是林杰、关锋帮她炮制的（林杰是师大历史系六零届[?]毕业生，《红旗》杂志有名的笔杆子、曾主持过该杂志的编辑工作，67 年 8 月被捕关在秦城监狱），我特别赞同师大校园内的一张大字报《谭厚兰是有保姆的‘左派’》的观点。

谭厚兰质疑工作组的大字报在师大产生了较大影响，她成了师大反工作组的名人，也成了工作组的头号打击对象，但谭有后台、“胸有成竹”、拒不低头。贴大字报反工作组的学生如物理系二年级的李庆林等，中文系四年级的王岚、中二的王颂平、李先华等，数学系数四的王淑娴等，历史系二年级的黄家林等，还有其他系的诸多学生先后被围攻被批斗，“抓右派”、“抓游鱼”甚嚣尘上，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气氛非常压抑。……

七月十六号晚约八点钟左右，学校突然广播，让大家马上到北饭厅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各自迅速地从宿舍来到北饭厅，只见一位约 60 岁左右的妇人坐在主席台的中央、临时摆放的长条桌子连桌布都没来得及覆盖，两旁也是空荡荡的，而主席台下面的右侧却站着工作队队长孙有余，耷拉着脑袋没了往日的神气。我恰巧就站在他的身旁，好奇地问：“您怎么不上主席台？”他没做声只是摆摆手、而眼睛却盯着主席台。

主持人宣布开会，原来台上的那位妇人是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她宣布工作组犯了路线性的错误，撤销工作组并让孙有余当众检查。这时，我真真切切地看到：孙像耗子见了猫那样，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走上主席台，先向曹鞠了一躬，然后走到麦克风前，检讨工作组 20 多天以来，镇压群众运动打击革命学生的错误，说话也不像 6 号傍晚、刚进师大时的讲演那么慷慨激昂了。曹轶欧不给一点情面，打断孙的讲话训斥道：“仅是抽象的否定，

具体检查不深入，需要进一步深刻检讨。”孙摘下眼镜、回过头来、点头哈腰地连说：“是，是。一定深刻检讨，一定深刻检讨。”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位副部长在中央领导（康办主任代表康生）面前，竟是如此的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真是常言所云：“当官不自由，无官一身轻”啊！

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七月廿七日达到顶峰。那天吃完晚饭，我和几位同学在校园的甬道上散步，突然学校东门口喧闹起来，我们急忙跑过去，原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乘着十几辆红旗牌小轿车到师大为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来了。第一次见到江青，心情格外激动，我在她的车前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带着黑框眼镜皮肤白皙的江青微笑着也向我们招手致意。我的心里不自觉地突然冒出：“这就是当代皇后啊！”（你看，一个大学学生的封建意识有多强。）人多的水泄不通，开道车缓慢地行驶着，后面的轿车紧随着，我们一直跟着车队来到师大的东操场。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陆续登上主席台，我们都在操场上站着，这时王力主持大会，介绍小组成员：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王任重、刘志坚，顾问康生，成员：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然后，江青讲话、细而尖的声音：“革命小将们、师大的生师员工（注：不是师生员工）同志们，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

台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冲破云霄、一浪高过一浪。接着陈伯达讲话，一口纯粹的闽南话，大家听不懂、还是由王力现场翻译，大意是“踢开工作组，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

接着江青说：“现在请康老讲话”（当时不仅江青、连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都称康生为康老），他一口山东腔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师大毕业的林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今天我把他带来了，你们要向他学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师大的程今吾是陆定一的大亲信，……。”刹那，“打倒程今吾”的口号顿时响彻师大校园上空（第二天程今吾被关进牛棚，后来大会批斗时，程一再强调自己和陆定一仅是上下级关系，反问‘大亲信’是什么罪？——这让我认识到什么叫‘莫须有’）。

接着，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王岚（女）控诉中文系工作组如何压制运动迫害学生。王岚非常有口才，没有讲稿、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的“故事”，江青还亲自给她倒了两次水，为她的讲演带头鼓掌。王岚真是才女，全场静悄悄的、被她的绘声绘色的讲演所慑服。后来，王岚成了谭厚兰的铁杆红卫兵，再后来因反“大庆”、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反总理，在70年抓“五·一六”时被判刑四年。

“八一八”，我们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誓师大会，先是林彪讲话，接着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彭小蒙讲话，当时刘少奇虽然站在天安门上但已排到第七位，我们私下议论：“刘少奇要完了”。城楼上有许多清华附、北大附、师大附等中学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主席带红卫兵袖章，最高指示：“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之后，宋彬彬更名宋要武、女附中更名“要武中学”。北京掀起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各个高校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谭厚兰成立了“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团”，首先加入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出身的子女，我们一般劳动者出身的子女都没份儿，黑五类出身的子女更是边缘化，被称为“狗崽子”，只许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当时到处标榜和宣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过去挺文静的女孩子也是口出秽言：“造他妈的反”，“滚他妈的蛋”。（文革余毒真深，到现在有些老头老太说话也总带“他妈的”，好像没这几个字就不会说话）。

有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及“8.18”的誓师，从8月20日到9月中旬，北京大街出现了红卫兵“破四旧”、剃阴阳头、剪喇叭裤、戴高帽游街、烧旧书、烧黑画、焚戏服，后来发展到对“五类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残酷暴行：轰走、抄家、打人、虐人、甚至升级到血洗、屠杀、活埋（如大兴大辛庄乡西白疃村），被冠之为革命的“红色恐怖”。

八月廿五日晚饭后，大约八点左右，学校的广播喇叭响了：“师大的革命师生请到二附中声援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连续播了好几遍。我和几位同学抱着好奇心，走出师大过马路到二附中，校园里跟逛庙会似的人山人海，一座教室的所有窗户都扒满了人、里

三层外三层的，我也挤进去扒着窗户往里看：妈呀！教室里跪着整整两排教师（有五、六十人），还有一位老师跪在前面，正被两个红卫兵用军用皮带狠狠地抽打着，抽一下惨叫一声、抽一下惨叫一声，实在是惨不忍睹，我迅速退出人群说了句：“怎么能打人呢？”旁边出现一个红卫兵模样的男孩问：“哪的？”“师大的”“什么出身？”“普通劳动者”“滚他妈的蛋，这是革命行动。”我看了他一眼，“怎么，不服？”一副三青子相，我知道不能与之理论，就和几位同学迅速离开附中回到师大校园，第二天听说二附中打死一名书记和一名教师。我实在不理解，人怎么这么恶呢？抡起皮带将铜扣狠狠地抽打在辛辛苦苦教他的老师头上（顿时血流如注），怎么下得去手呢？“良心”、“人性”都哪去啦？畜生不如，难道这就叫“革命”？

紧接着毛主席、林彪、文革小组成员接三岔五地八次接见全国进京的红卫兵，十月份红卫兵“革命大串联”开始了，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取“革命真经”。学校职工和我们这些非红卫兵负责接待来师大的师生，直到11月份出现步行串联，到延安、井冈山、韶山、遵义、上海党代会址、南京雨花台等革命圣地膜拜，我们才有机会跟着几个出身贫下中农的同学出去串联。我们一共五个人：刘志书、李运华、李元吉、金世仍、蒋世信。先乘火车到西安、去了交大看大字报，那会儿不敢去西安碑林、大雁塔，怕人说游山玩水；再乘火车到成都，这时胆子大些了，去了武侯祠、杜甫草堂；再乘火车到重庆，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红岩村、曾家岩、桂园等。乘火车很受罪，尤其西安至成都、成都至重庆两段，车厢里的过道、行李架、座位下面、甚至厕所里全都是人，我们虽然有座但根本动换不了，更别说吃饭喝水上厕所了，而且火车行驶的时间也没准儿，走走停停，每段行车至少二十多个小时，下了火车小腿和脚全都肿了，连步都迈不开。


大家决定从重庆步行到遵义，我们买了好多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打着北师大红卫兵小分队的旗子（在重庆做的），从九龙坡出发，沿途发放单行本宣传毛泽东思想；川黔的山景很美、小鸟也特漂亮、但很少看见人，我们背着自己的行李，每天走六、七十里路，

第五天我的膝盖疼的受不了，在桐梓，赤脚医生用5吋长的银针给我扎针医治，不管用，我还是咬着牙坚持走。沿途穿过四千多米长的凉风垭隧洞（当时是我国第二长隧洞，六零年竣工），隧洞洞口各有两名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只有红卫兵能走（我们有学生证），别人不能通过。火车道不好走，迈一根枕木、步子太碎而累，迈两根枕木、步子太大就得跨也累，我们交换着走。期间有三列火车通过，火车来时，我们分别躲进火车道边的亮着灯的安全洞里（只容一人），隆隆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还挺吓人。火车像个大活塞呼啸而过，过后，呜呜的风、暴土扬尘的，我们几个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灰头土脸地出了隧洞。

走到娄山关，关口立着一块儿天然的褐色大石头，竖刻遒劲浑厚涂有红漆的三个草书大字——娄山关，那是1932年贵州省民政厅厅长黄丕谟书写的。娄山关地处桐梓、遵义的交界，是黔北咽喉。我们在那儿一起背诵毛主席的诗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然后，大声喊着：“娄山关，我们来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娄山关就是一道狭隘的关口，我们重整队伍站成一列纵队，前面打着小分队的队旗，迈着坚定的步伐，唱着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豪迈地走过关口。

下山的不远处，我们走进路边的一间黑黢黢的茅屋，和当地的曾给红军做过向导的老人座谈，他谈红军那时很狼狈，像叫花子一样，还谈到红军首长视察地形时，遭到敌人的冷枪而牺牲，等等。

第二天我们胜利抵达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址。然后乘火车途径广西桂林（没下车）直达湖南长沙。长沙是金世仍同学的家乡，我们在那儿休整了几天就分手了：有的去了韶山，我因膝盖疼痛回到了北京。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

——恶战之前（十七）

陆伟国

黑云压城

1967年下半年，局势越来越严峻，越来越恶化。对于人民大学，由于四人帮及其小爬虫戚本禹直接插手两派斗争，形势就更加复杂。那年3月，戚本禹就来人大，特地说了人大哲学系一位副主任肖前是“革命领导干部”。仅仅几个月后，戚本禹自己倒台，肖前成了“王关戚在人民大学的代理人”。一下子，人大校内风云诡异，难辨莫测。

在这之前，还有个短暂的“复课闹革命”的插曲。7月10日，学校两派还联合召开了一个“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不过没几天就闹不下去了。8月份开始，由于受“7·20”事件的影响，校内气氛越趋紧张。就在这时，江青又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于9月4日、16日，连续表态支持“三红”打倒肖前，说肖前是“特务”，两派由此发生更激烈的冲突。“三红”抓走肖前，新人大则企图抢回，围攻我所住的东风3楼。但这次事件发生时，我没在校，没法在这儿详述事情的经过。

由此，两派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防区，大小冲突不断。双方都开始了进一步大规模武斗的准备，在楼内垒起了砖瓦石块，拳打脚踢的对打也时有发生。而且“新人大”还驱赶了住在红楼的“三红”教工。正当这危急时刻，好在北京卫戍区及时介入。11月25日，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亲自来校主持双方达成协议。

这种无休止的争斗，大概使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感到了厌烦。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返校，又一次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实现以教学班为

基础的大联合。翻过年来，为了进一步缓和局势，北京市革委通过北京卫戍区向部分高校派驻了由部队组成的“军训团”。人大也是试点单位之一。1968年2月20日，“军训团”进校，还在文化广场搞了个表面的仪式。当然比起1966年春工作组进校时，那气势又逊色了好多。但校园里毕竟出现了一个难得的缓冲期，就像大战之前往往会有一个异常寂静的片刻。这之前的2月5日，市革委还举办了“北京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第一批各校有二百多名头头去集中学习，试图消除派性。

时值初春，军训团的进校，使局面似乎有了些改观，以至于还有人以为文革要结束了，文革也该要结束了。这年的3月初，我们居然还出去植了一次树，地点在从中关村到黄庄的大路两侧。那天天气不好，很冷，呼呼的北风还夹着雪花。挖着冰冷坚硬的土块，听着路边大喇叭在大肆批判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扣向苏联的帽子也由“修正主义”升级为“社会帝国主义”，心里想，这种时候还能想到要植树，真是不简单，虽然还真没到植树的时候。那些树，不知后来活了没有。今天，中关村大街两边那高高的白杨，不知是不是我们当年所栽。

相互抓捕

但是，两派的仇恨并没有因此消除。1967年11月12日，“新人大”抓走了“三红”成员王昆顺，开始了双方相互抓捕的恶劣先例。于是，双方在校内外想方设法伺机抓捕对方人员，这是非常狠毒的一手。不论是哪派的人，一旦被对方抓去，结果都是很凄惨的。这儿摘录一段受害者的回忆：被抓去是1968年的5月份，当时打的时候被蒙着眼睛，打的人也不讲话。先是搧耳光，搧了好多次，那是个小伙子打的，你想这个力量有多大，而且是拼命地搧。耳朵也被打出血了，流了血了。后来是用铁锹把、皮鞭子、竹扁担之类的东西打，从腰部一直打到大腿，没有一点好肉。据说，打的轻重，除了看打人者当时的激愤程度，主要是看被抓者在对方组织里的位置、职务；在两派争斗中所起的作用，即所谓“罪行”的大小；以及“认罪”的态度。至少要打得求饶，发表“反戈一击、弃暗投明”的声

明，并用大喇叭对外广播。还得留下亲笔写的书面材料，签字画押，以便日后随时可以翻出来。此时的“反戈一击”，名为重新站对立场，跟上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变节行为。在文革中，叛徒是最严重的罪名，被认为是最可耻、最卑劣的，比走资派、黑五类还要坏。

而且，如此这般之后，抓人的这边还不收留，还要交回去用于交换被对方抓走的人。这样回来以后，当事人不但受了皮肉之苦，而且精神压力很大，抬不起头来。同一派的人，也因为他有过“悔罪”表示，有的人就看不起他，影响队伍的团结。看着被抓去的人如此凄凄切切，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不敢去和对方放手大干。所以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

被放回来的人，有的就此消沉，不敢再干。有的就一反常态，为了洗刷这等不白之名，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更为了复仇，嚥不下这口气，会更加无所顾忌，或四处控诉揭露对方的暴行，或豁出去拼命，在争斗中不顾生死、冲在前面。

这就是几十年的仇恨教育，在文革时的特有表现。当然，这样对待被抓人员，北京的高校比起外地有些地方剖腹挖心吃肉、满门抄斩，又要“文明”多了。一旦自己这方人员有被抓走，任何的抗议和交涉都是没有用的。只有也去抓对方人员，还得抓得更多，打得更狠，还逼着悔过，而后在喇叭里播出。以此来逼迫对方放人。这都成了什么世道？

隔一段时间，双方还要交换“俘虏”。大概是67年年底了，有一次在小礼堂专门举行了一个交换仪式，双方同学分别坐在中间过道的左右两边（小礼堂，建于1964年，正式的称呼是叫八百人大教室，因为那时不让盖楼堂馆所，所以就不能叫礼堂，哪怕是小礼堂）。主席台上，双方工作人员也是分站两边。仪式开始后，双方的“俘虏”们被扶着、抬着从两边的侧门进来，而后上主席台。在台上的中线，由一方交给另一方。从一见到他们出来，双方的群众都激动得不得了，喊声震天。

“俘虏”中伤最重的一个，还是用担架抬出来的。抬到主席台的中间，由对方接过去。伤轻的，裹着纱布，自己走过来。他们几个一过中线，就立即转过身跳起来，大骂对方。那种坚贞不屈，直叫人感动。台下双方更是喊声四起，能顶翻了天，情绪都激动地不得了。

没有当场打起来，真是不容易。双方的仇恨，自然也就越积越深。

这种事竟也落到了我们班同学的身上。一次，我们系有几个“三红”同学上街里去，在前门外大街贴大标语，其中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柏承庆同学和张春同学，结果被对方武装巡游的大卡车碰上。对方看见是“三红”的人在刷标语就跳下车，十几个人猛扑过去，光天化日之下，就公然抓人。柏承庆同学个子小，对方以为是围观群众，没引起他们注意。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躲过一劫，得以回校报告。而同去的张春同学则没有那么幸运，被对方抓走。

张春被抓走以后，我们都很担心，天天在等待着他的消息。可能是集中交换，容易场面失控出事情。张春同学是在被抓几天后单独放出来的。那天，忽听门外喊：“张春回来了！”我赶紧过去，大家正把他扶到床上。只见他紧闭双唇，神色怆然，脸上身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看来被打得不轻。扶他时，碰到哪儿，他脸上一阵阵地痛苦。躺下后，什么话也不说，能看到皮肤还在瑟瑟颤抖。我们看着都很心疼，情绪也很激动。很可能因为张春是我们班“三红”的小组负责人，因此而多挨了几下。他是被抓到北三楼的盥洗室遭到毒打的，而北三楼正是两年前我们住的宿舍。

当时，有一位“新人大”造反团的同学（从对方“新人大”造反过来的同学，不直接加入“三红”而是单独编队）看到这情景，气愤得不得了，径直跑到总部大楼，去拷打对方的被俘人员。通常打对方人员，不是由本班本系的人出面，而且即使是外系的，打起人来也是戴上面罩的。这次，他可是不管这些，上去就打，可见气愤至极。

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随后“三红”派来了一辆救护车，由班里两位女同学陪护去了北医三院疗伤。这之后，他再没有说起这件事，我们也再没提起过。很可能是这次创伤留下的后遗症，张春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近二十年，老同学们也没再联系上他。

谢富治问题

王关戚是因为搞极左、跳得比较高而垮台的。再往下呢？大家首先想到了谢富治。谢

富治一直在前台，跳得很高。而且，他和戚本禹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于是，北京高校的一些群众组织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的材料，掀起了“倒谢”活动，想以此立新功。

在这方面，“三红”中人更加积极一些。因为戚本禹在人大两派之间，更倾向于“新人大”，而“新北大”跟戚的关系也不好。由此，1968年3月初，人大“三红”的“一二二纵队”，跟“新北大”的二把手孙蓬一等人走得比较近，联想到了谢富治，于是就公开提出要揪“谢本禹”。3月16日下午，他们直接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3月17日“新北大”、人大“三红”等8单位的一些人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

但是，这一次，“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谢富治采取了保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谢富治始终是紧跟的，在打击、残害政治对手上是出了力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王、关、戚的垮台已经使自己元气大伤，不能再损失了。尤其是在王、关、戚垮台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针对极左大将的反对浪潮，比如上海在1968年春又开始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连对康生、陈伯达也有了反对的声浪。所以对谢富治不能不有所维护，并且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1968年3月15日，在接见四川代表时，江青就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是1975年才有。

反谢富治的活动，很快就过去了，但由此而更加深了人大两派的矛盾，还一直影响了下去，以至于一年后，毛又把这事情提了出来，还专门讲了一下。本书的后面还要讲到。

谢富治也是命不济，两年后就病倒住院，四年后就死于胃癌。谢富治死了才一年，1973年10月22日，他的继任者李震就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内。在那个又黑又窄的地下黑洞里，堂堂一个公安部长，李震半跪半躺，绳索揽在管道上，死状极为诡异。这事又把高层搅成一锅粥，自杀他杀争论不休，还抓了两个副部长于桑和刘复之。中央指定华国锋负责破案。直到1977年，才认定李震是自杀。

其实，就在那些群众组织炮轰谢富治的时候，高层根本忙不过来，正在进行一场更为激烈的搏斗，那就是文革的第五战役——“打倒杨余傅”。

杨余傅事件

1968年，大的形势是全国进入了一个武斗高峰期。有件事是起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被称之为文革第五战役的“杨余傅事件”。当时，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是空军副司令，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3月22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驻京团以上军队干部万人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林彪宣布打倒上述这三人。林彪说：“由于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要排挤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勾结余立金，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夺谢富治的权，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一切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凌晨1点35分，前来接见了与会人员。毛泽东讲，这件事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三天后，我们就听了这次大会的现场录音。

这又是一场震动，因为杨成武在毛泽东几次接见红卫兵和武汉“7·20事件”等重大场合，都是紧随在毛身边的，怎么也会出问题呢。我当时听了的感觉是，会上好像没有拿出他们三个人有什么严重问题的材料。就说杨成武讲了“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讲过头了；说他就想把代总参谋长的“代”字去掉，私心膨胀。就算是这样的话，也不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呀。

其实，酿成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杨成武是因为属于聂荣臻领导的华北晋察冀山头的，林彪一直想除之，在宣布的时候就已经直接讲明了。还有个更拿不出台面的，就是叶群要把自己说成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林彪就叫吴法宪和杨成武两人出个证明。吴法宪当然是二话不说就写了，可杨成武竟然当面拒绝，说1936年时自己在延安，叶群在北平，还不认识。余立金是新四军陈毅的部下，因为和林彪死党吴法宪同在空军，为吴法宪所不容。

傅崇碧被打倒的原因，更是蹊跷。那年初，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收藏在鲁迅博物馆里的鲁迅手稿不见了。江青知道后着急了，因为里面都是三十年代的事，说不定就会涉及到她。毛泽东立即批示周恩来主持追查工作。周恩来便指定由杨成武负责，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公安部长谢富治协助去追查手稿下落。三人商量怎么弄，傅崇碧

对这方面的情况熟悉，便说：“先去问问戚本禹，从那里肯定能得到线索。”他们到了秦城监狱，把戚本禹从狱里提出来一问。果然戚本禹说：“是我取走了。”问：“放在什么地方？”答：“我交给中央文革了。”傅崇碧又问：“谁让你拿走的？”答：“江青同志。”杨成武马上拉了傅崇碧向周恩来汇报。周赞扬他们办案迅速，要他们抓紧时间拿回手稿。杨成武就交由傅崇碧去完成。手稿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里，傅崇碧打电话到中央文革驻地钓鱼台，江青不在，江青的女儿肖力（李讷）接的电话。傅崇碧打完电话，便和工作人员坐了两辆北京吉普车赶往钓鱼台，进了会议室。一会儿，江青也进来了，一看有五名军人在，吓了一跳，顿时冲着傅崇碧喊：“傅崇碧，你竟敢带人冲击中央文革驻地。”傅崇碧莫名其妙地说：“我是来查收鲁迅手稿的呀。”江青冷冷地问：“手稿在哪里？”傅崇碧说：“就在你们中央文革保密室里，你把保密员叫来一问就可以知道。”保密员被叫来了，傅崇碧就问：“鲁迅的手稿是在你那里吗？”保密员说：“是啊，在我那里，整整四大箱，保存得好好的。”闹了半天，东西就在江青这儿。江青恼羞成怒，非说是傅崇碧带军队冲击中央文革，要杨成武以此定罪，杨成武坚决不同意。江青又把这事弄到林彪那儿，林彪正好要扳倒杨成武，于是就有了这个结果，干脆杨、傅两人一起倒。从这件事，也再一次看出江青这种人，这么狭隘，这么放肆，仗着有毛泽东，目无一切，几年的时间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完。就指着江青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文化大革命，能搞得好么？其实江青和她的同类人，包括当时的同类（如林彪一伙）和现在的同类（如薄熙来之流），原本应该说也是些聪明能干的人，为什么后来把事情搞砸？就是与体制、与环境有关。在一个相对封闭、专制的环境里，做了坏事，别人不知道，就算知道别人管不了，就会越来越猖狂，收不住手，这是必然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这件事是“王关戚事件”的延续。文化大革命的争斗已经发展到对军队、对实际控制权的争夺。王关戚想染指军权，矛头指向军内当权派，提出要“打倒军内一小撮”（这当然不是他们三个人自己的想法，背后是江青等），结果触怒了某些军队实力派。极左势力无奈之下，只能丢卒保车。然而，才几个月的时间，这“第五战役”抛出来的，

竟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这个反差，只能说明，这个斗争非但没能被平息，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波涛，而且延伸到了军队内部。更多的实力派之间（原有的和新起的，林和非林的，北京的和各地的，军队的和地方的等等），在打倒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了那块幕布的遮挡之后，就更直接、更激烈的碰撞起来，成了内部相互间的互殴。而且左倾势力显然章法已乱，已经无法平衡和平息身边的这些争斗和倾轧，刹不住车了，也数不清了。

这个事件，是在林和四人帮这两个极左势力之间，既是争斗也是相互利用、相互交换（包括对谢富治的掩护），难得地合作了一次，而最高指挥也准予了。“杨余傅事件”就是这种无节制争斗的产物，它再次说明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场“伪革命”。

“杨余傅事件”之后，一方面是林彪集团的势力借机急剧膨胀，另一方面是没有了杨成武这些人在中间，林彪一伙和江青一帮开始直接碰撞。以致于使毛泽东终于察觉到原来林彪比刘少奇是个更大的威胁，于是有了后来林彪事件的发生，当然那已经是在本书叙述的时间范围以外了。

高校学习班

高层的这种争斗，也很快激化了地方上在不同政治势力操控下的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轰然倒塌之后，各地上下出现了一些权力真空，各种政治势力拼了命地夺权、反夺权和再夺权（实际上是抢权、反抢权和再抢权），为此而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大片。此时，在很多地方已经分不出什么“保守派”、“造反派”了，都是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与对方拼死一战。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到后来已不是两派组织间对等的厮杀，而是与原有行政体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保守派”组织，在介入“三支两军”的部队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向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发起毫不留情的剿灭。“三支两军”所起的作用，各地很不一样，是非功过一言难尽，本书不说了。但是几乎所有武斗最激烈的地区，都有部队的插手，比如，广西、四川、湖北、江西等地。即使是由部队直接掌权的地方，他们对地方工作的运转也得借助于原先的地方行政体系、借助于所谓的

“保守”组织。“保守派”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得势，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这儿的“保守派”、“造反派”的称呼，都早已名不副实。所谓“保守派”，既不表明思想观念的保守，更不见行为方式的保守，全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形象。他们对待对立面群众的手段，照样是杀气腾腾、毫不留情，没有半点保守的样子。只是说，他们与原有的执行层有更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所谓“造反派”，也全然没有了运动初期高喊“滚他妈的蛋，罢他娘的官”的精神头了，说不定已经成了尖牙利爪撕咬之下的几片碎肉。在一些“造反派”势力尚有余力的地方，两派的决斗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眼睛都要喷血的最后关头。应该讲，就血腥残暴来说，这是在极左势力鼓动下，早期红卫兵极端分子那些恐怖暴行的延续。

而对于最高层来说，刘邓司令部既然已彻底垮台，心头之恨已除，对那时响应号召、拼死造反的人，已经无心也无力多去过问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时对某省某地的讲话、指示、表态，最多不过是加深了那里两派的裂痕，加重了争斗的激烈，造成了更多的反复，丝毫无助于那些造反派悲惨命运的改变，有时还不如不说。在造反派中，除了有些野心家、政治流氓应该受惩罚的之外，那些受旧体制压抑试图起而抗争的底层群众也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本书不是全面的文革史，对在这儿所提到的这个重大问题，无法更多地展开论述。只能请读者在观察和思索时，要关注到这个问题，注意到应有的更广的视野。

高校中的两派组织，情况与此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北京的高校，情况更有所不同，尤其是他们与地方政府行政体系的联系相对较少。但两派的争斗在这大趋势下，也立刻升温。前面讲到的2月20日军训团进校，带来的不过像是激战前的一刻平静。没过多久，在3月22日“杨余傅事件”的前后，形势急转直下。争权斗争的又一次高潮就冲击到了各个单位，各派群众组织之间抛开了所有的虚假和犹豫，局面迅速失控，拼杀急剧升温。一场空前的吞噬了多少人生命的恶浪又掀了起来。

前面已经讲到，北京市革委会为了解决北京高校派性严重、武斗蔓延的问题，决定分期分批开办“北京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1968年2月5日，在北京市委党校开办

第一期学习班，原定20所院校各派组织头头200多人参加，后增加为36所院校1400多人参加。学习班开办之初，在消除派性方面是作了努力的，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对于大多数院校来说，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特别是戚本禹垮台的消息传来，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天派”的组织提出了“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尤其是北师大“造反兵团”最起劲，因为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多次表态支持谭厚兰的“井冈山”。而北师大“造反兵团”认为学习班偏袒了“井冈山”，并于2月22日退出了学习班。这个行动还得到了人大“三红”等“天派”组织的支持。3月9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广播了《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的文章，批评了学习班。

3月13日和15日，由“新北大”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连会，矛头指向学习班。人大“三红”等十几所院校“天派”的群众组织参加。聂元梓在会上作了讲话，人大“三红”的代表也在发言中说：“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被说成是派性发作。”

作为群众组织，也就是在那儿瞎吵吵，想着投机一把。另一派“地派”也趁机活跃起来，举行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双方各自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为维护本派和搞垮对方而大肆活动。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游行队伍不断上街。地质学院“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的宣传车还开到人民大学，与人大“三红”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在这种形势下，学习班不但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而且也难以继续维持。3月30日，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作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

尤其奇怪的是，4月10日，各大报纸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条语录一出，无异于给原来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大火上又浇了一瓢油。过去两派对骂，不过是骂对方为保皇派、极左派等等，

现在都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都把对方骂成是国民党反动派、阶级敌人。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由不同观点的分歧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公然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此后，派性就从人人喊打的贬义词，一下子成了响当当的褒义词。大搞派性，成了理所当然。于是，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名义下，两派斗争就更加猖獗起来。

4月19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你们参加学习班离校两个多月了，我现在正式宣布学习班结束。”就这样，北京高校学习班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草草收场。这一场本来想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的努力完全失败。之后，各高校的两派斗争越演越烈，进入了一个直接面对面拼杀的新阶段。

北京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是，全市性的大规模对抗和武斗基本没有，但各高校内部的斗争却愈演愈烈。1968年3月29日，聂元梓的“新北大”从31楼开始武力驱赶对立面同学，拉开了北京高校群众组织之间武斗的大幕。4月起，清华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之间开展了一场真枪实弹的“百日大战”，前后竟然死了18人。有位当年的清华校友在本文网上连载时跟帖说，他们班有位很优秀的同学就在这次武斗中受伤致残、全身瘫痪，无法毕业分配，只好回老家，没几年就死了。文化大革命害了多少人！

面对局势的混乱、武斗的重新抬头，高层反而显得束手无策、举措失当。不但群众组织头头的学习班搞不下去了，草草收摊，而且令人不解的是，市革委和卫戍区还干脆来了个“四不”方针，“不管，不急，不压，不怕乱”。5月7日，市革委主任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议上就说：“反掉无产阶级的派性，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这使对立各派以为放手一搏、重整旗鼓的机会到了。 

【文 摘】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一首狂飙曲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述评

唐少杰

50年前的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这一大会成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一个著名事件。本文旨在对这一大会的缘起、过程和影响做一简要述评。

一 缘起

1966年6月上旬，整个文革以及清华文革开始之际，由于毛泽东暂居南方，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及负责文革运动。中共中央以北京市新市委的名义给清华大学派出了一个由528人组成的工作组。工作组进驻清华，接管了清华大学的各级领导职权。6月19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手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清华工作组。工作组带来了三个“直接”：一是直接造成了清华原有的干部体制瘫痪，把上到校长、党委书记，下到每一个基层干部在内的所有清华干部一律统统免职，列入“黑帮”或“黑线”人物，挂靠起来；二是直接带来了工作组与以清华工程化学系902班、年仅21岁的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众多激进学生的严重对立，造成了清华园文革初期的严峻形势。在“五十多天”里，工作组把700多名学生或其他人员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或“蒯氏人物”等等，还发生了数起自杀事件以及自杀未遂事件；三是直接给整个文革、给清华文革以及给“工作组模式”带来了某种“政治宿命”。毛泽东1966年8月5日所写的近250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根据清华文革的上述经历而拉开了文革整治刘少奇、邓小平的帷幕，换言之，基于清华文革伊始的问题，毛泽

东对刘少奇所进行的政治博弈，就是为了全面地、彻底地打开文革局面，要把刘少奇的问题逐步引入不归之路。

文革爆发后，如何广泛、深入地开展文革尤其是如何把文革推向全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整治。1966年10月，“无产阶级司令部”（特指文革初期的中共最高权力领导）正式提出了所谓以刘、邓为代表的镇压群众、阻碍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将进入1967年之际，按照毛泽东在自己73岁生日家宴对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所致的祝酒词“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¹，1967年的文革不仅是进入全国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部委）及其以下地区和单位、部门和机构的夺权，而且必然要伴随着整肃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名为“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实为中共党和国家传统的干部体制和秩序，以确保更大、更广、更深地铺排文革。1966年年底，中共中央有关机构开始对王光美的问题进行专案审查。此时，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划入敌我矛盾。然而，1967年初的文革形势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如何把推进文革群众运动与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问题联系起来。“形势比人强”。这一年年初，文革在全国各地、各单位或各级部门遇到的阻力主要就是刚刚成势的造反派运动与中共党和国家原有的干部势力及其运作机制的矛盾，甚至冲突。因而，加大加重打击刘少奇的力度就是制约文革第二个年头的契机。

“无产阶级司令部”做出了重大举措。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王力、关锋所写的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些文章集中抨击刘少奇，并首次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指名地公开加在刘少奇头上。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他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了却了毛泽东多年想批判电影《清宫秘史》

¹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543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关于毛泽东的这一祝酒词，有不同的说法：张春桥的回忆是“为全面内战干杯！”同上，第547页；关锋的回忆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同上，第548页；王力的回忆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同上，第550页；姚文元的回忆是“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同上，第553-554页。

的一个心愿，这篇文章不仅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修改，而且还经过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的逐句逐段的讨论和修订。¹毛泽东 1967 年 5 月在接见外国来访者时，把戚本禹上述文章的发表看作是文革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毛泽东认为，文革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标志第四个阶段，亦即“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²

在我看来，戚本禹这篇抨击刘少奇的“檄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首次地、公开地、正式地把刘少奇的问题当成了敌我矛盾、敌我斗争。对于清华文革来说，戚本禹的文章不啻是一个全力打击刘少奇的重大政治信号，后两篇文章还促使清华文革掀开了干部问题的盖子，把清华文革伊始的焦点之一即干部问题公布于天下。总之，把群众运动问题、干部问题同刘少奇、王光美以及工作组联系起来加以促动、深化清华文革，就势在必行；而对清华革命造反派学生们来说，可以大张旗鼓地批斗王光美了。

我个人推断，1967 年春初，刘少奇问题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这一年 2 月 16 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的“碰头会”（又称“怀仁堂会议”）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一些元老派代表人物对于文革新贵的指责和对文革揪斗干部的做法的痛斥，使得毛泽东高度关注此事，他对这些元老们的愤怒和反击意味着他本人把这种会议的争论或斗争看成解决文革胜败或存亡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刘少奇本人与这一在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来被称为“二月抗争”的会议不可能有直接的联系，尽管迄今为止诸多还没有公开发布的档案文献资料等等是否证实这一会议对于刘少奇问题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正是在毛泽东对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些元老派同志的处置之后，刘少奇问题很快恶化就绝不是偶然的了。戚本禹上述那篇“檄文”的“适时”发表，无疑是给文革全局发出的加大加重打击刘少奇及其所谓“资反路线”的一颗信号弹。从毛泽东以及“无产阶级司令部”

¹ 同上，下册第 602-606 页。

² 同上，下册第 607 页。

的角度来讲，能否大力批判或斗争刘少奇的问题则是关系到文革能否广泛、深入地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

从1966年7月底工作组撤离清华起，清华就不断出现指责刘少奇、批判王光美的呼声和浪潮。从1966年8月20日题为“王光美是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¹大字报的张贴，到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大会的举行，这里具有文革以及清华文革历史的连续性和必然性。文革伊始深受工作组乃至所谓刘少奇文革主张和文革做法（王光美就是其具体代表）迫害的清华学生们，对于工作组给清华文革所带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上述所带来的三个“直接”，就以批斗王光美的方式来进行一次大张旗鼓、别开生面的报复。

1966年10月初，蒯大富在清华几个红卫兵总部参加的会议上讲，他成立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得到了中央（实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要干两件大事，一是揪斗刘少奇、王光美；二是反对折中主义。后来这被说成是反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折中主义。10月9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八八”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的负责人开会，基于校内一片要求王光美回校检查声，决定批斗王光美。会后，他们去中南海。那天晚上8点，蒯大富带着400人进城，另一些人在清华东大操场等候开会。蒯大富等人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要求周恩来接见，要求批斗王光美，得到的是9点半以后给答复。²周恩来等接见了蒯大富等清华八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拒绝了这些代表的要求。周恩来说：“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要对她负责。她作检查也要准备，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检查，可以背靠背。”³蒯大富等人在中南海西门扎帐篷呆了一夜，次日晨，周恩来派周荣鑫，见了蒯大富等人，告知他们周恩来忙，不再见他们了。蒯说：“今天我们来，我

¹ 给予王光美的这个称号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有关。“十六条”第七条的题目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条指出“要谨防扒手”。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第三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2014年。

²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60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³ 李琦主审、力平、马芷荪主编、熊华源、安建设副主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7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另外，张绛在其所著的《我所知道的王光美》第14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上说1966年10月19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代表，说是他们二人一起来到清华，这不准确。

也没有打算把王光美揪回学校去。我是想看看给不给。”¹

12月18日，经过张春桥的授意，²推动了批斗王光美的进程。张春桥对蒯大富所讲的一番话绝不是代表他本人，而是出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策略。19日晚上，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成立“井冈山兵团”、名为“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的大会上，坚决表示“彻底砸烂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该兵团成立的第一次总部会议上，蒯大富等就决定继续争取揪斗王光美。在18日公布的“井冈山兵团决议001号”第一条就是要求王光美等人“回清华作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³12月25日，蒯大富带领清华大学6000余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近十辆广播宣传车在天安门、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和西单举行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口号，并对王光美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她十天内回清华园做检查。

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唐伟、陈育延、潘剑宏等十余人，他说：“你们提出揪斗王光美，我已请示了主席，毛主席不同意把王光美揪回清华去。”周恩来的建议是让王光美做书面检查。⁴周恩来说：“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他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⁵但是，井冈山兵团的某些人反其道而行之，实施了所谓“智擒王光美”的行动。⁶

¹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 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全宗号：2 案卷号：0023

²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召见蒯大富，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参见编辑组编：《历史的审判》，第313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年。

³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6年12月22日第4期。

⁴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2，案卷号：0022

⁵ 李琦主审、力平、马芷荪主编、熊华源、安建设副主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0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⁶ 1967年1月6日的“智擒王光美”的行动是由清华六个战斗小组组成的“捉鬼队”发起的，30多人参加。他们于那天下午3点半到西单附近的师大一附中，先以座谈的名义把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控制起来，骗王光美出来，剩下的20多人到西单附近的交通队和市立第二医院，控制了12部电话机，在急诊室成立了指挥部，一些人扮成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谎称刘平平遇车祸受伤，王光美开始不信，派刘婷婷和刘少奇警卫员来医院看望。“捉鬼队”说服了刘平平，让她打电话把王光美、刘少奇叫出来。稍后，就把王光美拉回清华园批斗。根据清华大学档案记载，“捉鬼队”的这一

1967年3月底4月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所追求的批斗王光美一事才有了转机。蒯大富认为，中央有全局部署，因为斗争刘少奇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是牵动全局的。“因为刘少奇不比王光美。斗王光美在六六年还斗不成，必须到六七年四月才行。”¹《井冈山》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指出：“斗争王光美，是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大战役，是彻底批判刘邓黑司令部的大战役，……斗争王光美，就是斗争刘少奇。”²其实，上述戚本禹的那篇文章发表后，蒯大富敏锐地意识到时机来临，

行动事前并没有正式请示蒯大富及井冈山兵团总部（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2，案卷号：0022）。据我本人2010年1月19日在深圳对蒯大富的采访，蒯证实，“捉鬼队”的领导人在这次行动之前只是跟他打了招呼，没有讲出具体的策划和步骤。蒯对于这位领导人的“招呼”，既不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否定，而是不相信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举动。无论怎样，“捉鬼队”的这一举动当时得到了兵团总部有关机构在使用车辆等方面的帮助。孙怒涛2017年4月16日关于此事向蒯大富发出的微信求证，证实了这一点。

1967年1月6日晚8、9点，井冈山兵团总部广播台播出“清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已被揪回，要全校革命师生立即去清华西操场参加斗争大会”的通知。蒯大富等人当时在静斋总部会议室开会，包括蒯大富在内的许多总部委员事先并不知道此事。在斗争王光美时，王光美反问批斗者的一些问题，使这些人无法回答。

1月7日，井冈山兵团发行了《号外》，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智拿王光美，巧斗刘少奇”为题，报道了前一日捉王骗刘的经过。《井冈山》报1967年1月11日第9、10期合刊第5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追述1月6日“智擒王光美”的过程，并发表了题为《好得很！》的评论，有所指地斥责“那些生怕革命烈火烧伤自己手指的政治庸人”，这种斥责后来被说成是“攻击周恩来”。这次批斗王光美一直持续到1月7日凌晨，王光美写出了“四点保证”后，被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带回中南海。在这次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期间，周恩来提出四点指示，一是同意让王光美检查，二是不要打她，三是不要侮辱人格，四是“检查后放她走。”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2，案卷号：0022

周恩来指责了这种“骗斗”活动。他在1967年1月7日接见七机部两派群众代表时，批评了这种骗斗王光美的行动，“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是背后耍鬼，这种作风不能提倡，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这是不正常的。”（李琦主审、力平、马芷荪主编、熊华源、安建设副主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但是，《周恩来年谱》对仅过了三个月，蒯大富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一事，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只字未提。1月20日，“捉鬼队”贴出了《关于周总理一·七讲话的声明》，公开表示对周恩来上述批评的不满和指责。该队还把此声明分别递交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和井冈山兵团总部。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的审查报告》，全宗号：2，案卷号：0022

1967年4月10日，在批斗王光美大会上，蒯大富还给“捉鬼队”授予了一面锦旗，并让该队全体人员登台亮相。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 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全宗号：2 案卷号：0023

¹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 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全宗号：2 案卷号：0023

²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8日特刊。

他主动请缨，向戚本禹提出要批斗王光美，戚本禹回答说：“这事我决定不了，你得请示总理。”¹ 史料证明，蒯大富不迟于4月3日就向周恩来提出了上述批斗要求。周恩来4月3日给蒯大富回复了一个小纸条，用铅笔写道：“大富同志：我回去问明情况，再由孙岳同志答复你电话。周恩来 四、三”²

4月5日，蒯大富提出批斗王光美的要求终于得到了同意的答复。

二 过程

1967年4月伊始，清华《井冈山》报加大了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为将要举行的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大造声势。4月5日晚上，蒯大富宣布了“中央批准在四月十日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斗”的消息，³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两点要求：（1）不武斗；（2）要准备好。⁴井冈山兵团5日晚发出“关于四月十日揪斗大扒手王光美的通告”，这个通告说，戚本禹的文章是向刘少奇“发起全面的、猛烈的总攻击的进军号，宣判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死刑！”⁵，定于10日上午九点半在清华大学主楼广场举行这一大会，“热烈欢迎全市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革命群众参加斗争大会。”⁶看来，自一开始，井冈山兵团就把这一大会定为全市性的、数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批斗大会。该兵团制定了“斗王光美方案”，成立了六个负责具体事务的筹备组。⁷该兵团的广播宣传车自6日至9日连续在北京城区广播上述通告。7日晚，该兵团还举行了斗争王光美全校政治动员大会，还成立专门的“斗争王光美指挥部”。⁸《井冈山》报对这些活动和10日的大会都作了及时的报道。

¹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630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²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 革委会 专案组 重要材料汇编（1967年1月23日至1967年9月2日）》，全宗号：2 案卷号：0252

³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8日特刊。

⁴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4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⁵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8日特刊。

⁶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6日第31期。

⁷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4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⁸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8日特刊。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主楼前的广场，¹人潮似海，红旗如林，一张张大字报俯拾皆是，一条条大标语格外醒目，一幅幅漫画随处可见，一声声革命战歌激昂嘹亮。² 据《井冈山》报报道，全市、全国三百多个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出席、几十万人参加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³ 大会主席台中央，矗立毛泽东的高大的全身塑像，两旁是巨大的毛泽东语录，上方悬挂“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和“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斗臭”的横幅标语。这一大会被称之为“一场震动全国、震惊全世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战役。”⁴ 另外，北京市有关部门派出1500名警察前往清华园，维持秩序。⁵

大会由井冈山兵团总部鲍长康（实为该总部第二号领导人）主持，任传仲（稍后成为该总部作战部领导人）代表该兵团总部发言，学生吴浩汀（蒯大富同班同学）发言控诉工作组，学生代表朱德义、干部代表王文兰、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革命群众的代表、原工作组组长叶林、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国裔专家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后发言，蒯大富最后发言。后六人的发言在《井冈山》报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



他们的发言题目分别为：朱德义：“把仇恨凝集在刺刀尖上”，王文兰：“戳穿王光美对干部的四条毒计”，桃园大队革命群众代表：“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恶”，叶林：“王光美是刘少奇派的刽子手”，李敦白：“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蒯大富：“粪土当年万户侯”。

这种发言安排非常有代表性，比较有分量的是蒯大富和叶林的发言。李敦白的发言最短。⁶

¹ 看来，王光美并不记得或知道她被批斗的地点是清华大学主楼前的广场，错以为是“大操场”（黄峥执笔：《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第4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刘少奇人生纪实》下册第874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也错以为批斗的地点是大操场。

² 参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6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³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报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

⁴ 同上。

⁵ 唐少杰2017年5月5日在清华大学对蒯大富的访谈。

⁶ 在批斗王光美大会之前，井冈山兵团总部办公室负责人潘剑宏向周恩来请示这一大会的方案，其中一条是不许外国人参加大会，潘剑宏向蒯大富转达这一条。蒯大富邀请了已是中共党员的李敦白参加，因为蒯大富未把李敦白当成外国人。

这一批斗大会不只是由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及蒯大富所主导，而且更是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一手掌控。戚本禹回忆道：“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¹

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仿佛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最大的公开的、集中的和密集的打击。因为，这次大会除了主要批斗王光美外，还把文革初期倒台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人以及有关部委领导人、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领导人等等，共计三百多人，被带入会场前台，进行“陪斗”。这也表明，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绝不是只限于批斗王光美一人，也绝不是只限于针对刘少奇本人。这次大会给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众多人胸前套上了标有各自名字的大牌子（很多大牌子故意把名字倒过来写出，并在名字上打上了叉，以示侮辱），用文革初期流行的“喷气式”斗争方式（即迫使被批斗者低头弯腰，身后有两人架着被批斗者的胳膊）惩罚他们。蒯大富在其发言中不仅声讨了刘少奇和王光美，还直面痛斥了薄一波、蒋南翔。²

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给人们留下的最大的印象就是批斗者们逼迫王光美穿上了旗袍、戴上了项链和草帽，对王光美加以羞辱，随着当时王光美被斗情景照片的广泛流传，仿佛

参见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 革委会 专案组 蒯大富交待材料（五）》，全宗号：2 案卷号：0216

李敦白 1940 年代后期就在延安认识王光美了。参见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第 110 页，林瑞唐译，台北，智库出版，1994 年；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红幕后的洋人 李敦白回忆录》，第 62 页，丁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文革初期，李敦白是著名的“坚定的国际反修战士”，他曾在北京许多单位、部门做过有关文革主题的报告或讲演，1967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一文，参见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第 91 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年。李敦白 1967 年 4 月初来清华园，与井冈山兵团部分人员座谈，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此《井冈山》用了两个版半的篇幅，发表了他的批判发言，参见《井冈山》1967 年 4 月 8 日第 32 期，很可能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敦白收到了参加 4 月 10 日大会的邀请。十分有意思的是，李敦白在其后来的回忆录或文章中都没有提及他参加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并发言一事。

¹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 630 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 年。

² 清华大学井冈山编辑部编：《井冈山》1967 年 4 月 11 日第 33-34 期合刊第二版。

这场批斗大会就是为了让王光美大出其丑。¹这一富有政治喜剧和闹剧的情节实际上源于1963年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几国时，在王光美着装问题上，王本人与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对于此事耿耿于怀，并由此而带来了恶作剧般的报复。

据蒯大富回忆：1967年4月4日，在中央的一次接见会上，蒯大富与江青、戚本禹隔桌对坐。江青对蒯大富说：“王光美去印尼穿那个妖精衣服，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戚本禹插话说：“她那些衣服都到哪去了？把它找出来。”蒯大富说是他回去告知井冈山兵团办公室负责人，让这位负责人去刘少奇家把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戴的衣服找出来，“在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上命令王光美穿上。”蒯大富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1971年8月受审查期间所写的交待材料中就承认：这一做法“丑化了这个大会。”²

据戚本禹的回忆录说：“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乒乓球项链，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来向总理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项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一样。总理不赞成，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没法向主席交待。”³戚本禹的这番说辞，既可以把蒯大富提及的戚本禹和江青的“出谋划策”推个一干二净，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又是怎样使王光美穿戴上了那些东西的。

据王广宇回忆：给王光美穿上旗袍、戴上项链和草帽，经过了江青等人，到王力、关锋，再到王广宇、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潘剑宏的谋划、安排、落实的过程。1967年4月初

¹ 1972年，侨居英国的周采芹女士（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的女儿），饰演了根据批斗王光美事件而改变的八集电视剧《斗争之课》（The Subject of Struggle）中的王光美。在周采芹著的《上海的女儿》一书中，译者把该电视剧名称译为两种：“斗争对象”和“斗争主题”，参加该书第211页、第274页。我以前也把该剧名称译为“斗争对象”，看过此剧后，我认为应译为“斗争之课”。参见周采芹著：《上海的女儿》，何毅华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上述电视剧由英国电视公司Granada's TV Production出品，制片人为Leslie Woodhead。该剧在英国以及一些其他地区播映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周采芹女士由于其出色的表演而获得英国本年度最佳电视剧女主角奖的提名。参见周采芹：《Daughter of Shanghai》，p.163，St. Martin's Press，New York，1988.

²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 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骗斗王光美问题的参考材料》，全宗号：2 案卷号：0023

³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630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的

（1967 年 4 月 10 日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被迫穿上旗袍、戴上草帽和乒乓球制成的项链）

一天深夜，王力、关锋从江青所在的钓鱼台 11 楼开会后回到钓鱼台 17 楼，关锋向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交代任务：“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带上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她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他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意见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

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王广宇立即赶往清华，找到潘剑宏，布置上述任务。潘剑宏向王广宇解释，井冈山总部没有主张给王光美带用木制的项链，而是用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不重，不会伤及王光美的。王广宇再三叮嘱潘剑宏，提出让王光美穿上出国服装，千万不要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潘剑宏答应照办。次日，潘剑宏给王广宇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是王光美的衣服在王光美家里，怎样才能取出来？王广宇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只有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潘剑宏请示周恩来。当天晚上，在王广宇的帮助下，潘剑宏在人民大会堂，乘周恩来接见某省群众两派代表的间歇，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即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给王光美穿上出国的服装和配饰，说了一些理由。周恩来开始不赞成这样做，认为用这种方式不好。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上述要求，周恩来无奈，只好同意让潘剑宏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出她出国穿戴的衣服和行头。周恩来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¹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上述不同的回忆，就是为了表明只是在批斗王光美大会上为了羞辱王光美而逼迫她穿戴什么衣物和配饰这一个问题上，那些文革当事人的追述和评议是多么微妙和值得回味，甚至令人感慨不已！

据王光美回忆：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刘少奇和王光美认为这是一个严重信号。刘少奇当晚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4月9日午饭时分，刘少奇的儿女告知父母，外面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三十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刘少奇非常不满，并做了最坏的打算，还立下了自己的遗言，嘱托自己的儿女，他死后要把把骨灰撒在大海里。4月10日清晨，清华造反派学生扣押了刘少奇、王光美的三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王光美、王光美做好了准备，把毛巾、牙刷

¹ 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第179-180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

等生活用品带上。大约早上6点半，清华造反派把王光美押至清华大学主楼八层一房间里。清华一些造反派学生在那里“审问”王光美，并与王光美就一些问题争吵起来，他们逼迫王光美穿上她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戴过的衣服和草帽，并给她的脖子套上了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王光美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周恩来派了一位秘书，与王光美同去，到了晚上7点，王光美回到中南海。¹当天晚上，那边，刘少奇在中南海家中悲愤得一口饭都没有吃；²这厢，清华井冈山兵团在清华主楼前召开庆祝晚会。³

在批斗大会之外，清华井冈山兵团还对王光美进行了由任传仲主持的三次“审问会”。⁴该兵团下属的杂志《井冈山》专刊1967年8月10日发表了“三审王光美”的记录稿，三审地点都是在清华主楼八层建筑学系的803室里进行，第一次审问是清晨6点左右开始，第二次是批斗大会结束后下午1点，第三次是在下午5点多。在审问王光美的那一房间，围坐着数十位井冈山兵团挑选出的人员，四处张贴有标语等，审问者和与会者疾言厉色，怒不可遏，给王光美造成心理压力，他们还不时地齐声喊出阵阵口号。这三次审问主要集中在对于戚本禹上述痛斥刘少奇的文章的看法、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责任以及在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清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及干部路线问题、王光美个人的经历等等。王光美在这三次审问的表现的确不凡，可谓据理力争，并不示弱，戚本禹后来评价道：“王光美在批斗会上回答了红卫兵学生提出的问题。她的回答都很得体、很巧妙。我都没有想到，一个大小姐出身的人，能有这样的才能，只是可惜她这个才能用错了地方。”⁵王光美的争辩有一特点，她始终坚持她与刘少奇从不反对毛泽东，不是什么反革命，她把审问者提出的诸多问题与毛泽东的主张或观点联系起来。今天再看这些审问记录稿，可以说，清华大学

¹ 黄峥执笔：《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第427-4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按照黄峥的此书推算，王光美那天在清华被批斗、被审问的时间似应为十二个小时左右，但是按照黄峥另外两本书的表述的推算，似应为十六个小时。参见黄峥编著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的第174页和黄峥编著的《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的第145页，这两本书都引用了“三审王光美”的资料，该资料标明那天第三次审问王光美的时间结束于晚间“10点零5分”。

²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第165-166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³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6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⁴ 清华大学档案馆：《工宣队 革委会 专案组 蒯大富交待材料（三）》，全宗号：2 案卷号：0214

⁵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册第630-631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的“文革小将”们并没有真正“战胜”王光美。至少有一点，王光美在这一天的批斗和审问中，并没有完全屈服。这三次审问的部分记录稿后来广为传播。¹

周采芹在其主演的反映这一“审问会”的电视剧《斗争之课》中，有一个细节很真实，她所扮演的王光美在步出屋外与清华学生争论时，她气得一下子坐在楼梯的台阶上，这与王光美当时经历的情景非常吻合，因为这一情景后来被井冈山兵团在有关报道中加以发挥。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据王广宇追忆，毛泽东、江青的女儿李讷（当时化名为“肖力”）“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²李讷“……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的旨意。”³江青实际上是“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⁴根据我对清华文革文献资料的查阅、对清华文革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对蒯大富的专门采访，⁵都没有证明李讷这一天到清华参加批斗会，是人们当时不知道李讷参加此会的“保密”，还是王广宇的上述说法根本就没有标示出来的基本证据？

“4月20日，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她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经过和4月10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报刊和造反派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作了申辩。信中流露出难以遏制的不服，说：‘我绝不是坏人，刘少奇也绝不是假革命或反革命。’”⁶王光美给毛泽东的这封信，至今都没有公布或发表。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制队摄制了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情景和过程，这部以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为专题的纪录片在完成后还不到十个小时就放映了，江青“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17楼放映厅看了现场纪录片。”⁷可以断定，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或负责人们都会看到这部现场纪录片的。这部纪录片的一些历史镜头后来

¹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41-25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第161-175页，黄峥编著：《刘少奇冤案始末》，第130-14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² 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第180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

³ 同上，第181页。

⁴ 同上，第180-181页。

⁵ 唐少杰2017年4月10日下午对蒯大富的专门电话采访。

⁶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第14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⁷ 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第181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

也被不同的历史文献影像所采用。

毛泽东对于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具体态度或具体反应（如批示），到今天都还没有发现文字上的记载或口述上的证明。

总之，1967年4月10日清华批斗王光美大会，以打击刘少奇为主，以羞辱王光美为主，这就必然带来了这场大会具有形式大于内容、闹剧大于正剧的特性。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酝酿、过程和效果中，不难看出，这一大会凝聚着文革初期繁纷复杂、浓厚刺目的政治色彩。从毛泽东的统领全局、以小打大、以点治面到他对文革最大矛头对象的欲擒故纵、旁敲侧击、穷追猛打，从周恩来的忙于左右、两头为难、疲于应付到他的老道干练、办事谨慎、善于妥协，从蒯大富及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异军突起、得意忘形、力求复仇到他们的呼风唤雨、急功近利、玩尽权谋，从江青的颐指气使、睚眦必报、为非作歹到中央文革小组几位大员唯江青马首是瞻、低声下气、诚惶诚恐，从刘少奇的险象环生、日趋危急、坐以待毙到王光美的临危不乱、负隅反抗、绝不服输，等等，这一切都在这一批斗大会的背景和场景中得到了清晰的映现。

三 影响

（1）批斗王光美大会，既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面决裂，特别是标志着前者对于后者的决绝斗争，也成为了自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所出现的一次最大、最广的批斗中共党和国家干部的大会，更显现了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中共党和国家的干部机制和干部势力在文革初期的总体衰退。这一批斗会很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参加人数最多、声势最大的批斗会。毋庸置疑，这一批斗会无论在规模、气势和格局上，还是在特性、意义和作用上，都远远超出了整个文革历史在北京乃至在中国大陆所有其他

批斗中共党、国家和军队等干部的大会或集会。¹



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被批斗的情景



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彭真被批斗的情景

¹ 这一批斗大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没有涉及文革之前和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元帅和高级将领，如彭德怀、罗瑞卿、黄克诚、谭政、许光达、张爱萍、苏振华、赵尔陆、吕正操、刘震、吴克华、王尚荣、肖向荣等，这可能与1967年4月之际或之前的文革形势有关。王广宇提及清华这次批斗大会的众多被批斗者中还包括罗瑞卿，王广宇显然是错了。参见王广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载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第17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的《清华大学一百年》也记载这次批斗大会包括批斗了罗瑞卿，显然错谬，参见《清华大学一百年》，第28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批斗王光美大会可以真正算得上是文革初期的中共中央高层斗争与基层文革群众运动上下互动、交叉推行的一大结果。它不仅凸显着中共中央高层斗争利用或依靠基层文革群众运动而带来的文革模式的内涵，而且凝聚着基层文革群众运动促动或制约中共中央高层斗争而具有的文革运作的底蕴，进而映现出中共中央高层斗争与基层文革群众运动砥砺相随、磨合相依的文革生死场的气数。显然，批斗王光美大会，既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厢情愿的“孤鸣”，也不是清华井冈山兵团势单力薄的“独唱”，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椽笔谱写、清华井冈山兵团合力演奏的一首文革“狂飙曲”！文革悲歌一曲，狂飙清华从天落。

(3)批斗王光美大会实际上是蒯大富以及清华众多激进造反学生对于工作组以及王光美的反击和清算。从工作组进驻清华到批斗王光美，大约经历了250天的时间。一方面，清华这250天的经历可谓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诡谲多变；这一经历从文革基层单位的典型意义和独特功能上来讲，真正使得清华在文革初期的舞台上独领风骚，无出其右；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同工作组所体现的传统的党的领导模式的对峙，正是由于同王光美所代表的刘少奇对文革的理解和运作的冲突，特别是在大半年里苦苦追求要在清华园里批斗王光美，蒯大富等清华激进造反学生以及稍后的井冈山兵团获得了他们巨大的“政治资本”。¹


(4)批斗王光美大会既不可能解决当时清华文革的矛盾和困难，也没有制止正在运行并即将发生的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内讧和分裂。在这一大会之前，作为清华当时文革主干的井冈山兵团内部已经危机四伏，不同势力及其代表明争暗斗；在大会期间，该兵团“有人却拒不参加斗争大会。纵队派头头沈如槐、宿长忠、张雪梅等在颐和园开会，策划分裂井冈山。”²他们对批斗王光美及其大会根本不感兴趣，力求采取和实施与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有所不同的文革政策和文革主张；在这一大会之后，不到五天，“四一四串联会”正式出现，它与井冈山兵团总部分庭抗礼。在这前夕，该总部还通过报刊痛斥那种“蒯派

¹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982年11月1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蒯大富反革命案”的起诉书、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刑事判决书”，都没有把蒯大富参与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列入起诉和判决的内容。参见编辑组编：《历史的审判（续集）》，第154-158页、第177-18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² 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第156页，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

必须全盘否定”的论调。¹五十天后“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宣布成立，它所造成的分裂和后来与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进行的决战，使清华文革驶入了一条无法逆转的黄泉之路。

(5) 批斗王光美大会促使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走向和命运加速转化。上述那期《红旗》杂志发表的关于清华干部问题的文章，实质上引爆了干部问题这颗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一大“政治定时炸弹”。历史证明，蒯大富以及以他为首的井冈山兵团通过批斗王光美大会的方式只能力图“上扫”文革初期原有中共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重大文革对象，而不可能“下除”由文革引起、由工作组直接带来的清华干部问题。在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前前后后，对于以广大的中、基层干部为主体的原有清华干部队伍（当时他们已被停职或被解职十一个月左右），究竟是加以“除恶务尽”，还是“平反平黑”？究竟是使他们继续处于边缘化、局外化甚至继续遭受歧视、迫害，还是团结、使用甚至依靠他们？就成为致使蒯大富的文革政治生涯衰竭乃至整个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破败的一个死结。

(6) 这个大会还带来了后人对于文革诸多问题的进一步反思。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杨澜主持的综艺节目（“杨澜访谈录”）中对王光美采访的视频。在王光美讲述自己的文革苦难经历以及在清华受到的屈辱之后，杨澜机敏而又直接地问王光美：你在“四清”和清华“蹲点”时冤枉没有冤枉过别人？王光美则以强调过去的运动造成人际问题很难讲清、不能再搞运动等做出了含蓄的回答。²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总之，对于批斗王光美大会的述评，尤其是对于这一大会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受害者和施害者而言，我所要继续追问和不断探寻的是：谁是这一大会的胜利者？谁是这一大会的失败者？对投身于文革的人们而言，有无胜利者？有无失败者？有无清白者？有无无辜者？最终，对于记忆和反思文革的人们而言，有无对文革的全面批判？有无对文革的根本变革？

写于2017年4月（清华大学校庆106周年日前夕）

¹ 社论：《决不允许转移斗争大方向》，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编：《井冈山》报1967年4月13日第35期。

² 杨澜访谈录·王光美（下），http://www.56.com/u40/v_NDIOMDg2Mzc.html 有的网站相关的同一视频（例如，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wNjkyNjA4.html）节目没有我所提到的这一段对话，可能做了处理。

【资料】

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

校文革执行反动路线铁证如山

造反派从“黑二组”抄出大批黑材料

一声霹雳，七月十日，罪行累累的北大特务机构黑二组被查封了！在黑二组盘踞过的燕南园 63 号和南阁，一大批黑材料被清查出笼，挖掘出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校文革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查获这两批黑材料是大快人心的革命行动，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从这些黑材料里，我们看到了刘邓反动路线的罪恶，张承先工作组的遗毒，校文革镇压群众的黑幕。凡是参加清查这些黑材料的造反派战士，无不义愤填膺，满腔怒火，禁不住迸发出一个声音：“彻底砸烂黑二组！”

一、“反×就是反动”的混蛋逻辑见鬼去吧

“反×即反动”，这个混蛋逻辑在我校曾风行一时，许多革命小将被这个“神圣”的大棒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陈必陶同志（北大第一张反工作组大字报的作者）的遭遇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二组藏有一份准备把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三十人打成反动学生的黑材料，他们的“反动言行”是什么呢？黑二组的钢鞭材料就是“反对×××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攻击×××同志。”反×就是滔天大罪，在今日的北大，×××高于一切！他们还不择手段地歪曲、篡改、捏造“反×”同学的一些话，给他们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帽子；即使个别人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也被二组列于反×的罪名之后，请看，新北大到底树立了谁的绝对威信！陈必陶同志仅仅因为对×有不满情绪，也被列了几大罪状，整了黑材

料！一棍子打了下去！孙蓬一之流打击革命小将真是罪该万死！这不过是打击革命闯将陈必陶的一个例子，在从黑二组清查出来的材料中间，校文革所整的革命小将的黑材料又何其多矣！

谢甲林（二组负责人）亲笔起草的所谓“加强对敌斗争”第八条还规定：反对过正确路线反对过校文革和×××同志的，“坚持不改的予以必要的教育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必要的批判，继续进行反动活动的要酌情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反×就是反动活动。

一个同学说：“反对×××就是反动，我想不通。北大不民主，有不同意见不能辩论，这样下去不好，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这居然也列入了“反动言论”，真是荒唐透顶，混蛋至极！

二、张承先的阴魂不散

工作组时期，二组就是张承先整革命群众黑材料的特务机构，现在的二组负责人谢甲林本来就是张承先手下的工作组员，张承先被赶走后，谢仍然负责二组工作，继承了张承先的衣钵，更加变本加厉地镇压群众运动。对张承先统治时期所整的黑材料，他们不仅不当众销毁，反而视为贵重遗产，珍藏起来。在南阁，法律系工作组时期的黑材料竟然完完整整地保存着；技术物理系 351 班有十四个同学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在张承先时期是挂了号的，他们的黑材料同样被谢甲林之流珍藏着，七月十五日终于“出土”了；“7.12”大字报的作者陈必陶同志被张承先之流整了黑材料，张承先被赶走以后，黑材料不仅原封不动，而且被黑二组接下去整，加上了新的黑材料。另有一些重要的黑材料已在查获之前被他们焚烧或转移。

三、触目惊心的特务活动

黑二组搞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专门对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尤其是对校文革提了不同意见的人。

这个特务机构是非常灵敏的，举一例说明：七月九日中午，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胡纯和与哲学系不同观点的同学进行了辩论，二组马上就整了一份九日辩论的详细情况备案。这个特务机构把革命造反派视为洪水猛兽，对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个小纸片都要拿去备案。0363“慨而慷”的同志在聊天的时候很随便地在《参考消息》上划了一些毛笔字和钢笔字，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帮助×××”五个字引人注目，他们却如获至宝，立刻送到了二组“备案”，而且由谢甲林亲自批上了意见。在七月十五日挖出的黑材料里，有一大批专用以查对反动大字报笔迹的学习笔记本、日记本，入党、入团申请书，大字报底稿等。经调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从不同意见的同志那里偷去的，或通过组织手段弄去的。

这个特务机构的人很多，手伸得很长。他们还有人专门打入各造反派组织的内部，刺探情报，寻找我们的所谓薄弱环节，以作为镇压我们的炮弹。无论是郭罗基同志在造反派的会议上的几句话，还是北京公社某负责人被歪曲了的出身，或者是革命组织内部的所谓的矛盾，诸如此类，形形色色，都在二组那里备了案。

在黑二组的记事本里有许多电话记录，充分说明了他们的特务活动的细致、周密到何种程度，例如：

1967.2.26 下午 4:40

接话人 ×× 发话人 ×××

单位是生物系

内容是详细汇报樊立勤（东方红公社成员）从晚上 10 点到早上 7 点的活动。

四、镇压“井”“红”的刽子手

校文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矢口否认把“井红”打成了反动组织，否定对井红实行血腥镇压的铁的事实，那么，请看我们从二组查获的铁证吧！

二组某人记录了校文革主任一段检查：

“首先对张承先、周闯的大字报认识不足，对井冈山、红联军反革命组织认识不足，态度暧昧，斗争不力，甚至答应了他们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在另一份材料里写道：“对于反对×××同志（校文革负责人）的井红的反动组织，他们恶毒攻击×××同志，他们罪恶滔天，就是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发至聂元梓、白晨曦、杨学棋、姜同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第22号简报写道：“在井冈山等反动组织恶毒攻击×××同志时，一些黑帮分子家属也趁火打劫，攻击×××同志。”这里已经很明白地把“井红”打成了反动组织。

为了镇压这些所谓的“反动组织”，校文革还专门拟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对敌斗争的几点意见》，说什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动组织和参加反动组织的，凡是罪恶的、民愤大的骨干分子就要批判斗争，凡是首恶分子，有严重罪恶的、有民愤的骨干分子要依法惩办。”军训期间，×××同志亲自指示：要趁军训机会，在二月十六日以前把“井红”所有的反动小组瓦解掉。

在查获的黑材料中，仅整“井红”的材料就有五十六斤多重，其中有所谓“井红反动言论集”13集，每集都有一百多页。“井红”的主要负责人张志握、俞启义、赵丰田等每人都有“反动言论集”。什么“怀疑刘少奇”，怀疑校文革负责人×××所提出的“上揪下扫”的口号等等，居然都收集在“反动言论集”里了。红联军成员、哲学系一年级的女同学罗雪莹运动中表现一直很好，参加红联军仅十几天，就有了很厚的一迭子黑材料！直到今年六月份还在整她的材料，她有什么罪呢？有一条罪状是：“去年八月底，作为系文革委员的罗雪莹竟带二十余人外出串联，破坏了哲学系的运动。”真是荒唐可笑！

上交中央的“情况反映”第33期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反逆流以来我们学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在年级范围内批判和斗争的有反动言行的学生和教员有76人，其中学生70人，教员6人，批斗后经公安机关依法批准拘留审查的有12人，

留在学校的64人，多数都是群众自行决定批斗的。在批斗后留校的64人中根据群众的要求我们同意批斗的16人，其中批判9人，斗争7人，占25%。”

这完全是谎报军情。他们所同意的16人里面，连张志握、俞启义、赵丰田、尹火这几个在万人大会上批斗一两次的还不包括在内，难道在以军训编制的万人大会上批斗竟然不需要校文革批准吗？此汇报又说：“我们没有同意，群众自发决定批斗的是48人，占75%。”实际上，据我们不完全统计，镇压井红期间，全校被批判的具有井红观点的革命群众达172人（不包括革命干部），可见他们是惯于欺上瞒下的。

五、打击革命群众，不容抵赖

沈达力同志在镇压井红期间被迫自杀了，她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死的，正在某些人口口声声否定把沈当作敌我矛盾对待之时，我们从二组×××的澡盆下查获了整沈达力的黑材料，卷宗上的日期是67.5.6，黑体字是“反动学生的材料”，目录上列了10个人，第5名是沈达力。显然沈达力被打成“反动学生”这一点是不可辩驳的。某些人又扬言：“沈达力的过硬材料他们没有拿走。”一语泄露了天机，说明还有更厉害的材料被他们销毁或转移了。其他的如我们所了解的物理系奚定平、历史系郑正卿等同志，根本就不是反动学生，却也被打成反动学生，整理了材料。

此外，还有西语系石天曙同志的黑材料。西语系是唯一对工作组批判得较彻底的系，而当时的系筹委会主任正是革命小将石天曙，但是今天这个革命小将被加上了十大罪状，第一条就是反×（校文革主任）。郭罗基同志是公认的左派，但自三月份以来只因给×××贴了一张大字报，一下子从坚定的革命左派转化到了“三反分子”的边缘，在黑材料里，夏××已经“揭发”：郭罗基要包庇黑帮分子王庆淑、支持王庆淑，如此，郭罗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的斗争历史也就一笔勾销了……目前已清查出来的还有化学系教师郭正义的黑材料，长期和陆平黑帮作斗争的校医院副院长郭湘贤的黑材料……

另外，还发现了他们派到各处去调查革命群众黑材料的大批介绍信和介绍信的存根，有到公安局的，有到监狱的，也有到其它地方的。如派人到公安部14处调查了红旗飘负责人牛泰升、牛辉林的材料，调查了红旗飘战士陈开龙的材料。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无中生有地制造黑材料，如污蔑牛辉林同志的父亲被斗，妹妹是联动，本身是联动头目，等等，等等。


六、陷害造反派，罪责难逃

自一月份以来，红旗飘、北京公社和革造总部相继造了校文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自造反之日起，校文革的政治陷害也就开始了。

前不久，北大流传着反动谣言，说什么陈伯达同志六.五讲话批评聂孙要收回了等等，众所周知，谣言根本不是〇飘战士造的，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罪名居然加到了我们的头上！七月十日陈伯达同志来到我校，谈话中王文耀（陈伯达同志的秘书）问聂元梓：“聂××同志，有人说你说陈伯达同志讲话是错误的，作了检查收回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陈伯达同志没等聂元梓回答就说：“哎，不是，不是，我知道这件事，我看到了油印材料”并说这份油印的材料署名是“〇”和“飘”。我们感到很震惊，立即对陈伯达同志说：“陈伯达同志，这是政治陷害，我们决没有印过这样的材料。”伯达同志又说：“不对，我看见过这个材料，的确看到了。”这个政治陷害出自何处？直到查获黑材料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查获了很厚的一大包材料，装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一个信袋里，这是谢副总理要求追查的一个案件。当我们在澡盆下面抄出时，材料已被烧毁了一部分。作为保卫组对一个谣言进行追查是可以的，应该的，但是整个一袋所装的完全是北京公社的材料，而同学揭发的不少关于新北大公社的线索却只字未有，这不是政治陷害是什么？联想到陈伯达同志所看到的那份伪造的署名“〇”、“飘”的恶毒的油印材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在黑二组的“思想动态”第40期上，他们还攻击北京公社“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否定新北大以×××、孙蓬一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是要夺权”！

反之，他们对反革命“四月形势图”（该图恶毒地把谢富治、关锋、林杰、穆欣等同志和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列入所谓的“反新北大逆流”并刻毒影射康生、周总理）的炮制者，疯狂炮打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吴子勇又是什么态度呢？请看黑二组的一份对吴子勇的处理意见：“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撤销其新北大编辑部编辑的职务。妥否？请批示。”完全是一付狗腿子奴才相！校文革和黑二组为何如此卖力地庇护这个炮制大毒草的家伙呢？原因很简单：吴是校文革的忠实追随者，保×的。更重要的是，“四月形势图”并非吴个人的发明，而是有来头的，校文革怕掀后台！与此类似的是，四月份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校园里跟着出现了许多攻击谢副总理以及关锋、林杰、穆欣等同志的大字报，黑二组连一张也未拿去备案，我们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却被黑二组成麻袋成捆地收集，而且都拍成了照片。在我们搜出了二组所整的周培源、郭罗基同志的黑材料后，他们又推说是托说，周是国际物理学家，郭是×××王子的老师，都是“保护对象”。那么请问，身为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同志不是更应该保护吗？为何没有她的材料？他们口口声声说，凡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都得整材料，那么孙蓬一调动万人炮打谢副总理，分裂中央文革的事实俱在，为何没有一点材料？

铁的事实已经说明：黑二组完全是北大校文革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是地地道道的狗腿子、特务机构！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红二组”，专的是牛鬼蛇神的政，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红二组”，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吗？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彻底砸烂黑二组，批臭黑二组。

原载《新北大报》1967年7月26日第三版

【资料】

最高指示

我们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限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限，而且保证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了。

恶毒的阴谋，卑劣的伎俩

戳穿新北大团、零、飘、井、方的谎言

七月十日晨六点多，新北大北京公社（○）、红旗飘（飘）、井冈山公社（井）、东方红（方）及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团）的少数头头，肆意歪曲伯达同志的讲话，公开抗拒伯达同志的电话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保卫组进行了洗劫。同时洗劫了南阁（哲学系办公室）、第二战斗队（揪叛徒组织）及其他几个系。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继续愚弄群众维持生计，井、方、飘、○中一小撮坏头头一方面派重兵封锁保卫组，同时在外面大造谣言，说在保卫组抄出了“大批黑材料”。十天后，又办了一个很可怜的《砸烂黑二组》展览。对此，保卫组已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他们在校内没有市场，于是又在他们的所谓《新北大报》第二号（7月26日）上刊登《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在全市大量放毒。他们既然放了毒，我保卫组为正视听，亦不得不向全市革命群众说明真相。

（一）保卫组（二组）的由来

《新北大报》说：“二组是张承先整革命群众黑材料的特务机构，现在的二组负责人谢甲林本来就是张承先手下的工作组员，张承先被赶走后，谢仍负责二组工作，继承了张承先的衣钵。”

这一派胡言论语是别有用心的，矛头不仅指向革命左派，而且恶毒地影射江青同志。去年八月四日，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在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踢开了工作组后，因缺乏保卫干部，经聂元梓同志要求，万人大会上通过，江青同志批准，留下了二十九名海军同志，暂搞学校保卫工作。这些海军同志在我校对敌斗争及警卫工作中有很大贡献。十一月初，海军同志撤走，校文革又从各系抽调十几人（有干部、教员、学生）组成新的保卫组。

现保卫组长谢甲林同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55年到北大，同陆平-王庆淑等走资派作过长期斗争，六三年被陆平黑帮赶出北大。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因斗争需要，应聂元梓等同志要求，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谢甲林同志于七月十一日回到北大。七月十二日北大就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谢甲林同志参加到反工作组的行列。一直到八月四日，谢甲林同志才任二组组长。保卫组的历史是光明磊落的，谢甲林同志的历史也是光明磊落的。

（二）所谓“反聂即反动”

“反聂即反动”是井、方、飘、○中一小撮头头在北大搞的最大的政治陷害，是为了达到他们打倒聂元梓，颠覆新北大红色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而制造的混蛋理论。

井、方、飘、○造谣说，“反聂即反动”是二组的“指导思想”，《新北大报》说：“即使个别人的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也被二组列于反聂的罪名之后”。他们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页根本不是保卫组写的材料里面所写问题的顺序（第一、反对聂元梓；第二、炮打中央文革；第三、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等等）栽到保卫组身上，污蔑我们“把反聂比反对毛主席放的地位还重要”。这纯系造谣

和政治陷害。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因此，尽管某些坏人怀着险恶用心，用极低级下流的手段和语言攻击、咒骂聂元梓同志，但是我们在工作中还一再强调：决不能仅仅因为反对聂元梓就同意批斗或者拘留那个人，我们同意批斗或上报拘留完全是根据公安六条，这在公安局有案可查。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我们就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

制造“反聂即反动”来陷害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小撮人，从去年 10 月份就开始挖空心思地制造流言蜚语，大整聂元梓同志的黑材料，在北京和全国造谣放毒，妄图把聂元梓和新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搞臭，其手段之毒辣，用心之险恶，可曰登峰造极！

（三）究竟谁是特务

《新北大报》说：“二组这个特务机构是非常灵敏的……7 月 9 日中午，井冈山公社负责人胡纯和和与哲学系不同观点的同学进行了辩论，二组马上就整了一份 9 日辩论的详细情况备案。”事实是：自井、方、飘、○中的一小撮头目们歪曲了伯达同志 6 月 5 日的讲话挑起全面“内战”以来，他们一再蓄谋挑起大规模武斗，有几个同学向保卫组和驻校解放军反映了哲学系有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迹象，保卫组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正大光明地放在桌面上，被他们用特务手段偷了去，反而大造谣言，迷惑群众。

《新北大报》还说：“这个特务机构把革命造反派视为洪水猛兽，对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个小纸片都要拿去备案。0363‘慨而慷’的同志在聊天的时候很随便地在《参考消息》上划了一些毛笔字和钢笔字，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帮助聂元梓’五个字被人注意，他们却如获至宝，立即送到了二组‘备案’，而且由谢甲林亲自批上了意见。”这张《参考消息》确实有的，但井、方、飘、○回避了要害。原来在《参考消息》的边上有一句攻击毛主席的话，被化学系一个同学发现后，交给了

保卫组的同志。这些人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竟将攻击毛主席说成是“无关紧要的”，包庇起来，真是狗胆包天；而把一些真正无关紧要的东西作为“罪证”，把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保卫组打成特务机关，他们究竟居心何在，不是很清楚吗？

《新北大报》第2号又说：“这个特务机构的人很多，手伸得很长。他们还有人专门打入各造反派组织的内部，刺探‘情报’……”保卫组究竟派谁、打入哪个组织去刺探情报，他们根本拿不出一事实来，至于郭罗基在O派会议上的讲话，那是被O们奉若“圣旨”到处贩卖的，传单遍地皆是，难道我们也有一份传单就是在刺探情报？这是混蛋逻辑！他们还搬出电话记录和工作手册称为“响当当的黑材料”，简直是无赖！

到底谁是特务？恰恰是井、方、飘、O中的一小撮头头！请看：六月五日以后，他们就派人以打扑克、打羽毛球为幌子在保卫组门口轮流监视、盯梢，甚至来辆汽车也要看看里面是谁，车号多少，O们的“坐派”资产阶级臭教授侯仁之洋洋自得地表功：他在七月九日至十日早晨整整监视了保卫组一天一夜，井、方、飘、O七月十日晨五点多钟就派人去保卫组值班室以来访为名，却胡扯些花草之类，对我保卫组进行监视，六点左右又换人去了一次。他们强行洗劫保卫组后，即对我组人员进行监视。我们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我们上厕所，他们都跟到门口，我保卫组长出门要被搜身，有些保卫组成员还被他们拍照。七月十日早晨开始洗劫保卫组时，井、方、飘、O的头头们讲，对保卫组的材料“不看、不抄、不拿”，“材料处理要征求全校革命师生意见”。到下午，就将保卫组的人全部赶出来，私自砸开材料柜，大量拍照，复制，并偷运到外校去。还制造假现场，进行种种卑鄙的政治陷害。他们还恬不知耻地拿我们所掌握的敌特、间谍嫌疑线索等作为“黑材料”来和我们辩论。这些事实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到底谁在搞特务活动！

（四）驳所谓的“黑材料”

1. 保卫组根据公安六条和毛主席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代校文革起草过一个文件叫《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对敌斗争的几点意见（讨论稿）》，是供常委讨论用的，没有下发执行。井、方、飘、○的一小撮头头硬说这个讨论稿是黑材料，说它是保卫组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指导思想（但遗憾的是却找不到“反聂即反动”的意思）。我们认为这个文件虽然还不成熟，有些地方尚待斟酌和修改，但在原则上没有错误。

2. 我们有个“情况反映”第三十三期，向上反映了一些有关批斗的情况。井、方、飘、○的一小撮头头偏说这是“谎报军情”，“欺上瞒下”。其实，我们写这个材料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原则上没有错误。《东方红》们公布全校被斗的革命群众达一百七十二人（甚至有的说是二百多人）才真是荒唐可笑的，有的连被他列入名单的本人也不承认被批斗过，以致成为北大的笑话。

3. 所谓的“黑调查提纲”问题。根据公安六条第四条的规定，保卫组搞过一个关于十一种人的调查提纲；根据二月十二日，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取缔六个反动组织及一些不合法组织的通告精神，我们起草过一个关于我校少数师生员工在校内外参加反动组织情况的调查提纲（后来未使用）。这些调查提纲都是以中央和上级的政策精神为依据的。井、方、飘、○的一小撮头头竟将此污蔑为“黑调查提纲”，但又一直不敢全文公布于众，可见他们是做贼心虚了。

4. 关于周培源等人的材料：

周培源（《北京公社》总勤务员之一），是国务院确定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有专人负责他的安全，曾记载过他的家庭成员、住址等情况，存入警卫卷宗。这样作完全是警卫工作的需要，绝对不是整黑材料。

郭罗基（《北京公社》总勤务员之一），他担负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根据上级外事机构和公安部门的意见，保卫组和人事部门一起对他进行过政治审查。保卫组存有对郭进行政治审查的材料。此外，南京有人寄反革命匿名信给郭罗基，为了弄清写信人是怎样知道郭罗基这个人以及他的地址的，以便寻找线索，保卫组根据上级公安部门意见协助公安局同志抄录了郭的社会关系的情况。这些材料竟被井、方、飘、○们统统叫成“黑材料”。至于所谓“座谈会记录”等材料，经哲学系同志揭露，原来是井、方、飘、○们从南阁群众组织那里抄来的材料，卑鄙的强加在保卫组的头上，进行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

牛辉林（《红旗飘》大头子），有两件事：其一，杨作森（现行反革命犯）在拘留所给中央文革写过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揭发了牛辉林曾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保卫组一同志到公安局听预审时将这封信作为杨的口供抄到了工作日记上。其二，在侦察破某案件进行摸底排队时，有的同志曾介绍：牛辉林的父亲执行反动路线被斗过，他妹妹参加过联动等情况，我们简要的在破案工作日记上作了记载。

牛泰升（《红旗飘》二头子），其舅舅在青岛被捕后，在狱中交代：到北京时，外甥牛泰升告诉他说，北京有个传说（这个传说是恶毒攻击林彪同志的）。青岛公安局持介绍信通过公安部来我校进行调查。青岛市公安局的那份介绍信也成了什么整牛泰升的黑材料了。

5. 所谓十个反动学生的材料问题。井、方、飘、○们搬出了一个所谓“十个反动学生名单”大做文章。这十个人中，有的问题不大，有的问题较大，性质较严重。这十个人的材料没有一份是保卫组整的。

林××（东语系），她给伊林、涤西写过一封信，表示同情和支持他们，公安局为了处理伊、涤案，曾委托我们向东语系要份林的材料。保卫组存放的就是那份材料。

赵××（地质地理系），摘帽右派，文化革命中反攻倒算，极不老实，群众斗争过他。保卫组存有他本人的材料以及别人检举揭发他的材料。

李××（东语系），大流氓，下乡搞四清时和几个女人乱搞，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污蔑红卫兵运动，更包庇其汉奸父亲，替他写假检查，等等。保卫组存有他的有关材料。

奚××（物理系）：本系同学曾将奚的一些情况写成文字材料反映给孙蓬一同志，孙蓬一同志将材料转给保卫组处理。保卫组认为不算什么重大问题，准备将材料退回，但尚未退回即被抢劫。

郑××（历史系），郑曾到保卫组自首，接待的同志听了他讲的以后，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仅留下他的一份自首书，以后亦未作任何工作。

崔××（技术物理系）：曾写两封信给康生同志，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进行攻击。康老对该信痛加批驳。保卫组保存有该信（及康老批驳笔迹）的照片。

赵××（技术物理系）：因写反动匿名信曾被依法拘留。保卫组存有复制的反动匿名信三封及上报材料。

庞××（化学系）反中央文革、攻击林副主席。该系班报送了材料，要求处理。保卫组批注，认为不够处理条件，建议在班上批判。现此人为井、方、飘、○得力干将。

沈达力（中文系）：《红联军》成员。其父是资产阶级臭教授，本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沈说伊林、涤西的大字报“不一定是反革命大字报”，高度评价乔兼武大字报“造三个大反”（即取缔共产党）是“代表一种新的思潮”；对中央文革去年八至十二月运动所下的结论表示不满，说：“都听中央文革的得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中央文革偏听偏信。”后抗拒本班同学的批判而自杀。死后，同学们把她的日记、遗嘱、信件等交到我保卫组备案。此外我们没搞过沈的其他材料。对于沈达力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井方飘○》们开大会、小会，写大批大字报，为

其“平反”、“开追悼会”、树碑立传，并去上海慰问、走访沈的妈妈资产阶级臭婆娘，真是鞠躬尽瘁。但对于死因至今不明的下中农儿子陈树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治保干部）他们却只字不提。井、方、飘、○的爱与憎不是很清楚吗！他们是哪个阶级的感情，不是很清楚吗！

李××（化学系）：大串联期间会家乡通县，纠集四清下台干部反攻倒算。公安局军管会做了调查，并将调查材料送我保卫组来征求处理意见。在保卫组存的就是这方面材料。

这十个人的情节不一样，有些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我们早已通知该系该班只作批评教育，再无继续进行工作。对此十人，我们从未对其中任何人定性。井、方、飘、○的一小撮头头在这上大做文章，说保卫组把此十人均打成了反动学生，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6. 关于陈××等三十二人的“黑材料”及平反问题。今年二、三月间，地球物理系两派争论激烈并互相揪，矛盾尖锐。为划清矛盾性质、避免群众斗群众，该系保卫干部根据记录和大字报整理了三十二个人的情况，交保卫组征求意见。我们认为除少数有炮打中央文革等言论外，均属一般认识问题，因此特意在卷宗上批注：

“此材料不算数”，并将意见转告该系保卫组，某些人想从这上面捞稻草是枉费心机的。

对于工作组时期的材料，在去年十月份中央军委平反指示下达后，我们就和海军同志一起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凡是应该销毁的材料，都交给了校平反小组。以后，又陆续清理了三次。井、方、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份工作组的材料，诬我们“把工作组的黑材料原封不动地接过来”并继续整理。我们郑重宣布，这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陷害！至于被宣布为保卫组窝藏黑材料的“铁证”的《六一八简报》是校文革发的批判材料，各组、各系、各班均有。

7. 井方飘○中的某些人大肆造谣说“黑二组保存了陆平黑帮整革命干部的大批黑材料”，但却拿不出半点证据。事实上，正是他们把陆平黑帮整聂元梓的黑材料接过去继续整，并大肆散布，处心积虑地要把聂元梓同志搞垮、搞臭，并扬言整聂元梓的材料要从十四岁整起。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想干什么？

（五）防备忘却，代为补遗

在“新北大报”第2号出版之前，他们开大会，办展览，散布了大量谣言，不知为什么，有好多没敢在“新北大报”上刊登。防备忘却，我们代为补遗，列举几例，略加驳斥。

1. 七月十日，他们说，从黑二组抄到了“整关锋同志的材料”，第二天说：“黑二组销毁了关锋的材料，还剩下一个标题——关锋的历史问题”，第三天说“烧的只剩下关锋二字”，第四天，他们便把自己放出的谣偷偷地收回去了，在群众的质问下，不得不承认“没有从二组抄到关锋的材料”。

2. 在他们办的“黑材料展览会”上，笑话就更多了。他们把我们从法律系借来的一个勘察箱说成是“黑二组的特务工具”，把我们在院中烧纸篓和垃圾的地方以及我们烧水的炉灶都拍成照片，说是“烧黑材料的现场”，把从便纸篓里挑出一些带字的什么问题也没有的碎便纸也贴了出来，滥竽充数。他们还贴出一张只剩油印着“蛇神”二个大大的破纸片。原来，这是俄语系同学给保卫组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份传单，封面上印有“牛鬼蛇神”四字，该同志认为没有保存价值，便撕掉扔入废纸篓，而他们是从烧废纸的垃圾堆上扒出来的。我们这个同志看到展览后，觉得好笑，便立即到俄语系又要来一份完整的，你们倘若需要，我们一定奉送。

在这个展览会上，还有一张用登记表排成的扇形照片，这是他们精心制造的伪证。事情是这样的，根据公安六条的精神，我们发了十一类人员情况调查表，各单位报上后，我们便把不符合条件的挑出来放在一起，注明“这些材料……不算数，

（1967年5月）”这些家伙，为捞稻草，进行陷害，大耍“起死回生术”，将原注

明销毁，把这些废登记表同另外一个带有“反动学生材料”字样的卷皮放在一起拍成照片，这样的“伟大创举”，实在太卑鄙了！此外，他们还把公安局在我们这里办案用过的笔迹材料，公开出览。恶毒是，他们告诉了本人，有意制造矛盾，扩大事态。令人怀疑，他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3. 他们说“黑二组大搞特务活动，把不同观点的人写的大字报都照了相。”可惜，他们不知道，我们除有一人刚开始学照相但还照不好以外，无一人会照相。我们那里确有一部分大字报底象，是公安局在我校办“98”案件时，因寻查笔迹，托人从大字报组借来的，尚未还回，人证俱在，休想栽赃。

4. 井、方、飘、○中的一小撮头头，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胡说校文革和我们逼疯了六人，逼死了五人。证据何在？前者，他们搬出了生物系的肖××；后者，他们搬出了中文系的沈达力。其实，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肖××确因有反动言行被同学批判过，但是，这个“被逼疯”的肖××，竟然能在这次打、砸、抢、抄保卫组时，出谋划策，大打出手，充当了拍照各种机密材料的要员，成了非疯子还难以胜任的重要角色。沈达力自杀，前面已经讲过了，且有她的亲笔遗书作证，不管你们怎样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逼死人命”的帽子，是绝对扣不到校文革和我们头上的。至于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在保卫组皆有死亡档案，有胆量的，请公布于众。

（六）关于六·二〇谣言问题

六月二十日深夜，《北京公社》广播台用高音喇叭广播了一个“辟谣声明”，将一个攻击毛主席和伯达同志的谣言公开向全校散布。根据谢副总理的指示，我们对谣言进行了追查。《北京公社》负责人侯汉清吓得要死，害怕追谣追到自己头上，于是对我们的工作百般刁难，这次却说保卫组对他们搞政治陷害。其实搞政治陷害的不是我们，正是他们自己！

（七）关于黑材料出土问题

七月十六日傍晚，“井、方、瓢、○”中的一小撮混蛋们又在全校散布一个爆炸新闻：“十五日晚在二组的院子里挖出了三大包地地道道的黑材料”，这些材料是“先烧了再埋的，表面有层薄薄的松土，上面还留有一大推纸灰”云云。

真是谣言越造越离奇！七月十日去砸保卫组时，派了二百人翻遍了院内每一个角落，连院子里的秧藤下、玉米地里都没有放过，也没有挖出黑材料，而时隔一周却“挖了”出来！说是“先烧了以后再埋的”。这简直是笑话！如果真的烧了为什么还要埋呢？七月十日以后连续下了几次大雨，如果真有“一层薄薄的新的松土，上面留有一大堆纸灰”，也早已被雨水冲刷得一干二净，面目全非了。这是起码的常识！另外，伯达同志七月十日凌晨讲完话后，你们五点后，就两次派人去保卫组以“来访”为名进行监视。且侯仁之先生从九日至十日早晨为你们整整监督了我们一天一夜，我们怎么能够在院子里烧，在院子里埋呢？

你们早就大肆宣扬，说我们转移和销毁了“黑材料”，然而却拿不出一事实来，连你们自己的战士也不相信。“黑材料出土”完全是井、方、瓢、○的头头们为愚弄群众，陷害北大革命派而制造的大阴谋！自七月十日以来，你们重兵把守保卫组，任何人不准进入，锁起门在里面究竟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必须老实交代！

你们说是我们埋的“黑材料”，我们早就写出大字报请你们拿到有关部门去鉴定，看究竟是七月十日以前埋的，还是以后埋的！或者是公布出来，让群众鉴定。时至今日，你们为什么不敢鉴定，也不敢公布？！

结束语

我保卫组自成立以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广大革命群众协助下，在上级公安机关指导下，坚决打击了一小撮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对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实行了专政，并积累了敌特、问题重大线索资料。我们的工作尽管有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我们

的工作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妖风。因此，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早就恨透了我们，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砸烂我们！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反动派早就骂我们是“特务”、“混蛋”。我们感到无限光荣。

七月十日井、方、瓢、○的坏头头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砸了我保卫组，并砸了其他几个组织，大肆抢劫，盗窃国家重要机密文件和材料，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其严重损失，造成十分恶劣的政治影响。北大“7.10”事件发生后，苏修广播台立刻为之喝彩，国内外反动派手舞足蹈。这一事件大长了反革命妖风，要“把北大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搞“二次革命”，要“从去年八月开始翻！”要为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翻案！这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对革命左派如此仇恨！为什么对新北大红色政权如此仇恨！为什么在我们正要全力对刘、邓进行大批判的时候，他们全面挑起内战，把矛头对准革命左派？！联系去年十一月份他们大保刘、邓，说什么“刘、邓是人民内部矛盾！”聂元梓贴邓小平的大字报是“捞稻草”、“出风头”“唱修调”；联系去年十二月他们大反中央文革；联系今年一月他们大反康生同志，难道不发人深思吗？井、方、瓢、○中的一些骨干分子是新北大地道道的臭老保！


“7.10”事件暴露了我校老保组织井、方、瓢、○的头头们的虚弱。“7.10”以后又陆续发生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类似事件，他们近于疯狂了，已经走到绝路的边缘！井、方、瓢、○中广大受蒙蔽的战士，应当觉醒了！你们要独立思考，想一想北大斗争的实质，想一想伯达同志和谢副总理的指示，不要跟着几个头头瞎跑了！

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应当团结起来，彻底埋葬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

打倒陆平、彭珮云！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保卫组《红卫卫》战斗队

【读者来信】**1. 王家斌：开展红色文化研究是当务之急**

红色文化研究是文革研究的一部分，是文革研究的深化和扩展。在官方大力宣传文化自信文化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当下，对红色文化进行客观中性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中国有三千所大学，有两千所文史研究单位，有数百家专业刊物，却没有一家关心这件事。《记忆》244期发表编者按，呼吁开展红色文化研究，同时还发表了哈佛李洁和斯坦福李海燕研究“红色遗产”的文章。这是一个既令人欣慰，又令人难过的开端——偌大的中国，如此重要的选题，竟只有这么一个不见天日的民间刊物张罗，令人不知说什么好。

2. 蒋健纠错

《记忆》245期第6页说《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姚文元写的，发表在1974年。误，此文是张春桥写的，发表于1975年春。

【封面说明】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揭批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批示新华社全文广播，6月2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同时，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配发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从6月1日至6月6日，北大校内共贴出五万多张大字报。图为北大学生在校园内贴大字报的情景。

（照片选自罗平汉著《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